

吳何以亡——陸機〈辨亡論〉研究*

戴 燕**

摘要

〈辨亡論〉一向被認為是陸機在吳亡後入晉前寫的作品，但是從陸雲寫給陸機的信就可以看到，它不僅是對賈誼〈過秦論〉的模仿，也同陸機計劃編寫的《吳書》有很密切的關係。元康八年前後，陸機為著作郎，參與西晉官方組織的晉史修纂，同時他也在與陸雲反覆討論如何寫出貫徹他們吳人視角的《吳書》，而最後定稿的〈辨亡論〉，就是這部未完成的《吳書》的總論。

關鍵詞：陸機〈辨亡論〉、《吳書》、陸雲〈與兄平原書〉、陳壽《三國志》、議「晉書限斷」、賈誼〈過秦論〉、干寶〈晉紀總論〉

* 本文承專家匿名評審，提出寶貴意見，謹致謝忱。

** 上海復旦大學中國語言文學系教授。

一、〈辨亡論〉是模仿〈過秦論〉而作

《晉書·陸機傳》記載吳滅以後，陸機（261-303）「退居舊里，閉門勤學，積有十年。以孫氏在吳，而祖父世為將相，有大勳於江表，深慨孫皓舉而棄之，乃論權所以得，皓所以亡，又欲述其祖父功業，遂作〈辨亡論〉二篇」，¹ 說明陸機寫〈辨亡論〉，主要在闡述吳何以興，又何以亡。² 而早在陸雲（262-303）寫給其兄陸機的信裡，有一次已經提到〈辨亡論〉，說：

誨欲定《吳書》，雲昔嘗已商之兄，此真不朽事，恐不與十分好書。同是出千載事。兄作必自與昔人相去。《辨亡》則已是《過秦》對事，求當可得耳。陳壽《吳書》有《魏賜九錫文》及《分天下文》，《吳書》不載，又有嚴、陸諸君傳，今當寫送。兄體中佳者，可並思諸應作傳。³

信的大意是，陸雲接受陸機委託，為其《吳書》定稿，陸雲相信這是足以令人不朽的事業，只是不容易寫好，但如果陸機來寫，則必定與眾不同，因為他的〈辨亡論〉已能媲美〈過秦論〉，《吳書》自然不在話下。信中還說到陸雲會將陸機《吳書》所無，而見於陳壽《三國志·吳書》的，〈魏賜九錫文〉、〈分天下文〉及嚴峻（?-?）、陸績（188-219）（或陸瑁〔?-239〕）等人的傳，⁴ 抄送給陸機，希望等他

¹ 〔唐〕房玄齡等，《晉書》（北京：中華書局，1981年），卷54，頁1467。

² 裴松之（372-451）注曰：「陸機著〈辨亡論〉，言吳之所以亡。」〔晉〕陳壽撰，〔南朝宋〕裴松之注，〈三嗣主傳〉，《三國志》（北京：中華書局，1981年），卷48，頁1179。李周翰注曰：「辨亡者，所以辨興亡之事也。」〔晉〕陸機，〈辨亡論〉，見〔梁〕蕭統編，〔唐〕李善等注，《六臣注文選》（北京：中華書局，2012年），卷53，頁987。

³ 〔晉〕陸雲著，黃葵點校，〈與兄平原書〉，《陸雲集》（北京：中華書局，1988年），卷8，頁137。

⁴ 陳博認為此「《吳書》不載」，是指章昭（204-273）的《吳書》不載。見陳博，〈章昭《吳

身體好起來，便能考慮決定哪些人應該寫入他的《吳書》。這封信談到《吳書》的部分，中間忽然插進一句「〈辨亡〉則已是〈過秦〉對事」，當然是陸雲為了激勵陸機，盼望他完成不朽的《吳書》。後來，劉勰（465-522）在《文心雕龍·論說》篇引用這句話，但他刻意同陸雲唱了個反調，說：「陸機〈辨亡〉，效〈過秦〉而不及，然亦其美矣。」⁵ 意思是〈辨亡論〉效仿〈過秦論〉，卻比不上〈過秦論〉，不過也算寫得好的。

〈過秦論〉是漢代賈誼（200-168 B.C.）所作，最早出現在《史記》，一者見於〈秦始皇本紀〉的「太史公曰」，一者見於〈陳涉世家〉的「褚先生曰」。〈秦始皇本紀〉「太史公曰」謂：「秦之先伯翳，……至周之衰，秦興，邑於西垂。自繆公以來，稍蠶食諸侯，竟成始皇。始皇自以為功過五帝，地廣三王，而羞與之侔。善哉乎賈生推言之也」，下面是引賈誼的話，自「秦兼併諸侯山東三十余郡」，至「是二世之過也。」⁶ 〈陳涉世家〉「褚先生曰」謂：「吾聞賈生之稱曰」以下也引賈誼的話，但是自「秦孝公據崤函之固」，至「而攻守之勢異也」，僅為〈秦始皇本紀〉「太史公曰」所引中間一段。後來人把這一段叫作上篇，把〈秦始皇本紀〉「太史公曰」所引叫作上下篇。⁷ 到了《漢書》中，《漢書·陳勝項籍傳》的「贊」說「昔賈生之〈過秦〉曰」，首先是有了〈過秦〉這個題目，其次，就像《史記·陳涉世家》

書》考》，《文獻》1996年第3期，頁75。俞士玲意同，見俞士玲，《陸機陸雲年譜》（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9年），頁278。

⁵ 〔梁〕劉勰著，范文瀾注，《文心雕龍注》（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1年），卷4，頁327。

⁶ 〔漢〕司馬遷著，〔劉宋〕裴駟集解，〔唐〕司馬貞索隱，〔唐〕張守節正義，《史記》（北京：中華書局，1975年），卷6，頁276-284。

⁷ 「褚先生曰」，裴駟《集解》引徐廣說「一作『太史公』」。見〔漢〕司馬遷著，〔劉宋〕裴駟集解，〔唐〕司馬貞索隱，〔唐〕張守節正義，《史記》，卷48，頁1961-1962。案，據裴駟《集解》引徐廣說，一本並無見於《陳涉世家》的「秦孝公」以下，僅有「秦並海內」而上接「秦並兼諸侯山東三十餘郡」，司馬貞（679-732）《索隱》則謂「孝公」以下，為上篇，「秦兼併」以下，為下篇，見〈秦始皇本紀〉，卷6，頁283。

「褚先生曰」一樣，它也只引了〈過秦〉的上篇，此外，凡〈秦始皇本紀〉引作「秦王」、〈陳涉世家〉引作「始皇」的地方，它都從後者寫成「始皇」，〈秦始皇本紀〉引作「孝公既沒，惠王、武王蒙故業」，〈陳涉世家〉卻引作「孝公既沒，惠文王、武王、昭王蒙故業」這一句，它也寫成「孝公既沒，惠文、武、昭、襄蒙故業」，⁸ 不光從後者增加了「昭王」，又加進「莊襄王」，顯得表述愈發完整。而後來，蕭統（501-531）編《文選》收入賈誼的〈過秦論〉，採用的便是見於《史記·陳涉世家》與《漢書·陳勝項籍傳》的這一版本。⁹

賈誼在《史記》、《漢書》中都有專傳。他的作品，除了〈過秦論〉，《史記·賈生列傳》還錄有〈弔屈原辭〉、〈鵬鳥賦〉，同時提到當漢文帝（203-157 B.C.）封淮南厲王（199-174 B.C.）四子為列侯時，「賈生諫，以為患之興自此起矣」，又「數上疏，言諸侯或連數郡，非古之制，可稍削之。」¹⁰ 這些上疏和諫言，《史記》未載，可是《漢書·賈誼傳》卻採錄了其中的「陳治安之策」等，〈賈誼傳·贊〉解釋增錄的原因，是「劉向稱『賈誼言三代與秦治亂之意，其論甚美，通達國體，雖古之伊、管未能遠過也』」，故「掇其切於世事者著於傳云」。¹¹ 意思是賈誼關於三代及秦漢政治的論述異常精彩，「通達國體」，比古代的伊尹（?-?）、管仲（720-645 B.C.）都不差，值得推薦。

而賈誼的這些政論，在漢末三國時期，仍然受到重視，被頻繁徵

⁸ 〔漢〕班固撰，〔唐〕顏師古注，《漢書》（北京：中華書局，1983年），卷31，頁1820-1825；並參見顏師古注曰：「惠文王，孝公之子。武王，惠文王之子。昭襄王，武王之弟」，頁1822。

⁹ 李周翰〈過秦論〉題下注曰：「誼有〈過秦〉二篇，論秦之過也，此第一篇也。」〔梁〕蕭統編，〔唐〕李善等注，《六臣注文選》，卷51，頁951；又「孝公既沒」下，作「惠文、武、昭蒙故業」，頁951。

¹⁰ 〔漢〕司馬遷著，〔劉宋〕裴駟集解，〔唐〕司馬貞索隱，〔唐〕張守節正義，《史記》，卷84，頁2503。

¹¹ 〔漢〕班固撰，〔唐〕顏師古注，《漢書》，卷48，頁2265。

引。在曹魏，當曹丕（187-226）立太子後，常稱漢文帝寬仁玄默，有賢聖之風，當時儒生與他辯論，講的道理就是「其於聰明，通達國體，不如賈誼。」¹² 魏明帝（204-239）時，高堂隆（？-237）反對濫建宮室而不顧「天下彫弊」，他上疏引秦亡的教訓，說「秦始皇不築道德之基，而築阿房之宮，不憂蕭牆之變，而脩長城之役」，「豈意一朝匹夫大呼，而天下傾覆哉」，也引賈誼對漢文帝的警告，說「昔漢文帝稱為賢主，躬行約儉，惠下養民，而賈誼方之，以為天下倒懸，可為痛哭者一，可為流涕者二，可為長歎息者三」，逼迫魏明帝不得不作「觀隆此奏，使朕懼哉」的表態。¹³ 而衛覬（？-？）當時上疏，也是舉賈誼的例子，說：「昔漢文之時，諸侯強大，賈誼累息以為至危。況今四海之內，分而為三，羣士陳力，各為其主。」¹⁴ 王基（190-261）上疏，仍是同樣的話，以為「昔漢有天下，至孝文時唯有同姓諸侯，而賈誼憂之曰：『置火積薪之下而寢其上，因謂之安也。』今寇賊未殄，猛將擁兵」，「若子孫不競，社稷之憂也。使賈誼復起，必深切于曩時矣。」¹⁵ 到正始年間，齊王芳（231-274）的族祖曹叅（？-226）上書曹爽（？-249），表達他對於州牧郡守「皆跨有千里之土，兼軍武之任」，「而宗室子弟曾無一人閒廁其閒」的狀況極度擔憂，¹⁶ 還是引賈誼的理論，說：「諸侯彊盛，長亂起茲。夫欲天下之治安，莫若眾建諸侯而少其力，令海內之勢，若身之使臂，臂之使指，則下無背叛之心，上無誅伐之事。」¹⁷

在孫吳，當太子孫和（224-253）與魯王孫霸（？-250）二宮爭霸時，顧譚（205-246）上疏，提示「有國有家者，必明嫡庶之端」，

¹² 〔晉〕陳壽撰，〔南朝宋〕裴松之注，〈文帝紀·裴注〉，《三國志》，卷2，頁88。

¹³ 〔晉〕陳壽撰，〔南朝宋〕裴松之注，〈高堂隆傳〉，《三國志》，卷25，頁714-715。

¹⁴ 〔晉〕陳壽撰，〔南朝宋〕裴松之注，〈衛覬傳〉，《三國志》，卷21，頁612。

¹⁵ 〔晉〕陳壽撰，〔南朝宋〕裴松之注，〈王基傳〉，《三國志》，卷27，頁751。

¹⁶ 〔晉〕陳壽撰，〔南朝宋〕裴松之注，〈武文世王公傳〉，《三國志》，卷20，頁594。

¹⁷ 〔晉〕陳壽撰，〔南朝宋〕裴松之注，〈武文世王公傳〉，《三國志》，卷20，頁593。

說的是：「昔賈誼陳治安之計，論諸侯之勢，以為勢重，雖親必有逆節之累，勢輕，雖疎必有保全之祚。」¹⁸ 到蜀為魏吞併，華覈（219-278）上疏分析形勢，仍然是以賈誼為例，說漢文帝時，賈誼尚且「以為可痛哭及流涕者三，可為長歎息者六」，「其後變亂，皆如其言」，如今吳面臨的局勢，已是「誼之所欲痛哭，比今為緩，抱火臥薪之喻，於今而急。」¹⁹ 陸機的父親陸抗（226-274），對吳的前途，本來就懷著深憂遠慮，此時他也說：「臣每遠惟戰國存亡之符，近覽劉氏傾覆之釁，考之典籍，驗之行事，中夜撫枕，臨餐忘食。昔匈奴未滅，去病辭館，漢道未純，賈生哀泣。」以霍去病、賈誼自況，而陳時宜十七條。²⁰ 所以，陸機入晉後作〈五等諸侯論〉，在論述上古及周秦漢的「經略」時，講到「漢矯秦枉，大啟侯王」，可以說他是自然而然就用了「賈生憂其危，晁錯痛其亂」的典故。²¹

據陳壽《三國志·吳書》記載，孫權（182-252）有一次向太子太傅闕澤（?-243）詢問：「書傳篇賦，何者為美？」因為闕澤有意讓孫權聽到人們對時政批評的聲音，「欲諷喻以明治亂」，便推薦道：「賈誼〈過秦論〉最善」，孫權於是「覽讀焉」。²² 闕澤的提倡和孫權的示範性閱讀，對於〈過秦論〉在吳成為經典，自然有推波助瀾的作用。也正是因為如此，熟悉賈誼及其政論的陸機才會對它刻意效仿，寫出〈辨亡論〉，而一心鼓勵陸機的陸雲，也才會說出「〈辨亡〉已是〈過秦〉對事」。

〈辨亡論〉現存最早是載在《三國志·吳書·三嗣主傳》「評曰」的裴松之注裡，裴注先引「孫盛曰」，斥責孫皓（243-284）罪當不赦，

¹⁸ [晉]陳壽撰，[南朝宋]裴松之注，〈顧雍附顧譚傳〉，《三國志》，卷52，頁1230。

¹⁹ [晉]陳壽撰，[南朝宋]裴松之注，〈華覈傳〉，《三國志》，卷65，頁1464-1466。

²⁰ [晉]陳壽撰，[南朝宋]裴松之注，〈陸遜附陸抗傳〉，《三國志》，卷58，頁1355。

²¹ [梁]蕭統編，[唐]李善等注，《六臣注文選》，卷54，頁999。

²² [晉]陳壽撰，[南朝宋]裴松之注，〈闕澤傳〉，《三國志》，卷53，頁1249。

接著引〈辨亡論〉，謂：「陸機著〈辨亡論〉，言吳之所以亡。其上篇曰……」，「其下篇曰……。」²³ 孫盛（302-373）是東晉史家，他出生時，剛好陸機去世，裴注引他的《魏氏春秋》等著作，相當不少。引陸機文，也有如《晉惠帝起居注》、〈顧譚傳〉、〈陸遜銘〉等，〈辨亡論〉是其中之一。²⁴

〈辨亡論〉的上篇，從「昔漢氏失禦」寫起，按照孫堅（155-191）、孫策（175-200）、孫權、孫亮（243-260）、孫休（235-264）、孫皓的順序，首先講武烈皇帝如何在「皇綱弛紊」的漢末由荊南起兵，長沙桓王又如何底定江外、「賓禮名賢」，到大皇帝時，因有「異人輻輳，猛士如林」，所以「謀無遺算，舉不失策。故遂割據山川，跨制荆吳，而與天下爭衡」，即便後來幼主蒞朝，景皇聿興，也為「守文之良主」，至歸命侯初期，仍能保持「元首雖病，股肱猶良」的局面，到最後，是「羣公既喪」，才變得「黔首有瓦解之志，皇家有土崩之釁」，以至於晉的「王師躡運而發」，吳「軍未浹辰而社稷夷矣。」²⁵ 在以這種全景方式寫下吳的興亡過程後，〈辨亡論〉首次提出吳何以亡的問題：「夫曹、劉之將非一世之選，向時之師無曩日之眾，戰守之道抑有前符，險阻之利俄然未改，而成敗貿理，古今詭趣，何哉？」²⁶ 陸機要問的是，對手並非不可一世，吳能夠依賴的自然條件也沒有變化，軍事上的攻守策略也是現成的，究竟是什麼原因導致了吳的徹底崩潰？而他也有一個簡單的結論，即「彼此之化殊，授任之才異也。」²⁷ 〈辨亡論〉上篇結尾這一自問自答的句式，與〈過秦論〉上篇結尾所說「一夫作難而七廟墮，身死人手，為天下笑者，何也？仁義不施，而攻守

²³ 〔晉〕陳壽撰，〔南朝宋〕裴松之注，《三國志》，卷 48，頁 1179-1182。

²⁴ 〔清〕趙翼著，王樹民校證，〈裴松之三國志注〉，《廿二史劄記校證》（北京：中華書局，2013 年），卷 6，頁 135。

²⁵ 〔晉〕陳壽撰，〔南朝宋〕裴松之注，〈三嗣主傳〉，《三國志》，卷 48，頁 1180。

²⁶ 〔晉〕陳壽撰，〔南朝宋〕裴松之注，〈三嗣主傳〉，《三國志》，卷 48，頁 1180-1181。

²⁷ 〔晉〕陳壽撰，〔南朝宋〕裴松之注，〈三嗣主傳〉，《三國志》，卷 48，頁 1181。

之勢異也」，²⁸ 頗為相似，毫無疑問，這是對〈過秦論〉的模仿。

〈辨亡論〉的下篇，從「昔三方之王也」寫起，首先分析魏、漢、吳三國鼎立的局勢，指出曹、劉各有其功過，至於吳，因為有長沙桓王的「求賢如不及」和大皇帝的「推誠信士」、「量能授器」，使「忠臣競盡其謀，志士咸得肆力」，所以到其中期，便開闢了「地方幾萬里，帶甲將百萬。其野沃，其兵練，其器利，其財豐」的局面，「國家之利，未巨有弘於茲者。」當此時，「借使中才守之以道，善人禦之有術，敦率遺憲，勤民謹政，循定策，守常險，則可以長世永年，未有危亡之患。」²⁹ 〈辨亡論〉的這一句，明顯是對〈過秦論〉「藉使子嬰有庸主之材，僅得中佐，山東雖亂，秦之地可全而有，宗廟之祀未當絕也」的模仿。³⁰ 而在這裡，它又一次提出吳何以亡的問題。陸機首先轉述一種流行看法，以為「吳、蜀唇齒之國，蜀滅則吳亡」，而給以否認，他指出蜀不過是吳的鄰國，可以互相為援，卻絕非吳之存亡的關鍵。由此寫到蜀亡以後，吳國在陸公（陸抗）的努力下，確曾有一段時間，依然是「烽燧罕警，封域寡虞」，而因太康之役、廣州之亂，導致「邦家顛覆，宗廟為墟」，³¹ 都是發生在陸公去世以後。這裡，他引《詩經·大雅·瞻卬》說：「人之云亡，邦國殄瘁」強調沒有了賢人，³² 國才病入膏肓，無可救治。由此推導出吳之所以亡，是亡在天時、地利、人和這三項未能很好配合，「恃險而已」的道理，所以在最後的總結裡，陸機說的是：「故先王達經國之長規，審存亡

²⁸ 〔漢〕司馬遷著，〔劉宋〕裴駟集解，〔唐〕司馬貞索隱，〔唐〕張守節正義，〈秦始皇本紀〉，《史記》，卷6，頁276-284。

²⁹ 〔晉〕陳壽撰，〔南朝宋〕裴松之注，〈三嗣主傳〉，《三國志》，卷48，頁1181。

³⁰ 〔漢〕司馬遷著，〔劉宋〕裴駟集解，〔唐〕司馬貞索隱，〔唐〕張守節正義，〈秦始皇本紀〉，《史記》，卷6，頁276。

³¹ 〔晉〕陳壽撰，〔南朝宋〕裴松之注，〈三嗣主傳〉，《三國志》，卷48，頁1178。

³² 〔漢〕毛亨傳，〔漢〕鄭玄箋，〔唐〕陸德明音義，《毛詩注疏》，收入〔清〕阮元校勘，《十三經注疏》（臺北：藝文印書館，2013年），卷18，頁694。

之至數，恭己以安百姓，敦惠以致人和，寬沖以誘俊乂之謀，慈和以給士民之愛，方能「保其社稷而固其土宇」。³³ 而這一總結，也恰好呼應了〈過秦論〉下篇的結語：「故先王見始終之變，知存亡之機，是以牧民之道，務在安之而已。」³⁴

〈辨亡論〉效仿《史記·秦始皇本紀》「太史公曰」引「賈生之言」，即《漢書》所記〈過秦論〉，不光是它的主題，甚至它的結構、句式，因襲〈過秦論〉的痕跡都非常明顯，但是它指出吳亡的原因，與〈過秦論〉分析秦之所以亡，結論並不相同。〈過秦論〉認為秦是亡於暴政，它說「秦之盛也，繁法嚴刑而天下振；及其衰也，百姓怨望而海內畔」，指的是秦從兼併諸侯到治理統一天下，本來已經完成了取天下到守天下的轉變，守天下的秦，本來應該設立一套新的制度，可是「其政不改」，所以說秦亡，是亡在它的政治制度上。³⁵ 而〈辨亡論〉卻認為，吳在孫權時代的勃興，到孫皓時代最後毀滅，導致這一變化的原因，在於「授任之才異也」，即用人標準有了改變，擔當國之大任的，不再是過去那樣的人。所以，它說到吳的末期，「四州之氓非無眾也，大江之南非乏俊也，山川之險易守也，勁利之器易用也，先政之業易循也」，一切外部條件都不曾變，只要因循過去就可以繼續吳的生命力，但卻沒有保持住，「所以用之者失也」，這是吳亡的原因。³⁶

與賈誼寫〈過秦論〉，已經是站在漢初的立場批判秦的政治制度不同，陸機寫〈辨亡論〉，還是以吳人心態，從吳的內部，對吳之所以亡加以檢討，因而歸咎於用人失策，亦即行政上的失誤，這兩種結

³³ 〔晉〕陳壽撰，〔南朝宋〕裴松之注，〈三嗣主傳〉，《三國志》，卷 48，頁 1182。

³⁴ 〔漢〕司馬遷著，〔劉宋〕裴駟集解，〔唐〕司馬貞索隱，〔唐〕張守節正義，〈秦始皇本紀〉，《史記》，卷 6，頁 284。

³⁵ 〔漢〕司馬遷著，〔劉宋〕裴駟集解，〔唐〕司馬貞索隱，〔唐〕張守節正義，〈秦始皇本紀〉，《史記》，卷 6，頁 278。

³⁶ 〔晉〕陳壽撰，〔南朝宋〕裴松之注，〈三嗣主傳〉，《三國志》，卷 48，頁 1182。

論，還是有很大差別。因此，〈辨亡論〉雖然是效仿〈過秦論〉而寫，但有時它們同樣的句式，表達的意思卻不盡相同。比如〈過秦論〉在寫到秦歷經孝公（381-338 B.C.）及惠文（354-311 B.C.）、武（329-307 B.C.）、昭（325-251 B.C.）而逐步強大，令諸侯恐懼，「以致天下之士，合從締交，相與為一」的時候，它說因為當時孟嘗君（？-279 B.C.）、平原君（？-251 B.C.）、春申君（？-238 B.C.）、信陵君（？-243 B.C.）等都能「尊賢重士，約從離橫」，所以六國之士，便有「寧越、徐尚、蘇秦、杜赫之屬為之謀，齊明、周最、陳軫、昭滑、樓緩、翟景、蘇厲、樂毅之徒通其意，吳起、孫臏、帶佗、兒良、王廖、田忌、廉頗、趙奢之朋制其兵」，這些人聯合一道「叩關而攻秦」，卻無奈秦已經很強大，因此「秦人開關延敵，九國之師逡巡遁逃而不敢進。」³⁷ 在這裡，〈過秦論〉列出有六國之士約二十個人的名字，用來說明當秦處於「吞二周而亡諸侯」的上升期，縱有韓、魏、燕、楚、齊、趙六國的這許多策士良將，也擋不住它「并海內，兼諸侯」的氣勢。³⁸

〈辨亡論〉模仿〈過秦論〉「……之屬為之謀……之徒通其意……之朋制其兵」的句式，³⁹ 在上篇寫到大皇帝時代有猛士如林時，也歷數：

張昭為師傅，周瑜、陸公、魯肅、呂蒙之疇入為腹心，出作股肱；甘寧、凌統、程普、賀齊、朱桓、朱然之徒奮其威，韓當、潘璋、黃蓋、蔣欽、周泰之屬宣其力；風雅則諸葛瑾、張承、

³⁷ 〔漢〕司馬遷著，〔劉宋〕裴駟集解，〔唐〕司馬貞索隱，〔唐〕張守節正義，〈秦始皇本紀〉，《史記》，卷6，頁279。

³⁸ 〔漢〕司馬遷著，〔劉宋〕裴駟集解，〔唐〕司馬貞索隱，〔唐〕張守節正義，〈秦始皇本紀〉，《史記》，卷6，頁283。

³⁹ 〔漢〕司馬遷著，〔劉宋〕裴駟集解，〔唐〕司馬貞索隱，〔唐〕張守節正義，〈秦始皇本紀〉，《史記》，卷6，頁279。

步騭以聲名光國，政事則顧雍、潘濬、呂範、呂岱以器任幹職，奇偉則虞翻、陸績、張溫、張惇以諷議舉正，奉使則趙諮、沈珩以敏達延譽，術數則吳範、趙達以機祥協德，董襲、陳武殺身以衛主，駱統、劉基彊諫以補過。⁴⁰

寫下這三十五位公卿大臣的名字，是為了表明吳在那時人才輩出，因而能做到「謀無遺算，舉不失策。」⁴¹ 即使到歸命侯初期，也仍然有「大司馬陸公以文武熙朝，左丞相陸凱以謇諤盡規，而施績、范慎以威重顯，丁奉、鍾離斐以武毅稱，孟宗、丁固之徒為公卿，樓玄、賀劭之屬掌機事」。而由於這十人的存在，也還能維持「元首雖病，股肱猶良」的政局。⁴² 整個〈辨亡論〉，如果再加上下篇提到的大皇帝時，還有「士燮蒙險而效命」，總計就有大約四十六個豪彥志士的名字。而這四十六名文武大臣在〈辨亡論〉中的出現，正如同護衛吳的屏障，與〈過秦論〉中二十名六國之士之於秦的作用剛好相反，他們是吳之所以興盛的保證，是吳的功臣。將這些名字一個一個地寫下來，也讓〈辨亡論〉顯得像一個將相表，又或是一篇「功臣頌」。

二、〈辨亡論〉與晉史修纂

與陸機同時代的蜀人陳壽（233-297），對於吳之所以亡，在《三國志》裡表達過他的看法。他說孫權「能自擅江表，成鼎峙之業」，可是也「性多嫌忌，果於殺戮」，晚年尤甚，故「讒說殄行，胤嗣廢斃」，吳之覆國，「未必不由此也」，⁴³ 而後孫亮「童孺而無賢輔」，孫休「不能拔進良才」，孫皓濫施刑罰、虐用其民，使「群下人人揣恐，

⁴⁰ 〔晉〕陳壽撰，〔南朝宋〕裴松之注，〈三嗣主傳〉，《三國志》，卷48，頁1179-1180。

⁴¹ 〔晉〕陳壽撰，〔南朝宋〕裴松之注，〈三嗣主傳〉，《三國志》，卷48，頁1180。

⁴² 〔晉〕陳壽撰，〔南朝宋〕裴松之注，〈三嗣主傳〉，《三國志》，卷48，頁1180。

⁴³ 〔晉〕陳壽撰，〔南朝宋〕裴松之注，〈吳主傳〉，《三國志》，卷47，頁1149。

皆日日以翼，朝不謀夕」，其罪該「腰首分離，以謝百姓」，晉封他歸命侯，「豈非曠蕩之恩」。⁴⁴ 陳壽之意，以為從孫權、孫亮、孫休到孫皓，每一個人都難辭其咎。這是一個由蜀入晉的史官的態度，是從根本上質疑吳立國的合理性。據說，晉武帝（236-290）曾問過替孫皓寫了請降文的薛瑩（?-283）：「孫皓之所以亡者何也？」⁴⁵ 薛瑩是吳有名的史家，在孫皓時代坐牢，又被流放到廣州，他的回答是：「歸命侯臣皓之君吳也，昵近小人，刑罰妄加，大臣大將，無所親信，人人憂恐，各不自保，危亡之釁，實由於此。」⁴⁶ 而據說吳亡之初，孫皓在〈遺群臣書〉中，也承認由於他的「政教凶勃」，令「百姓久困塗炭」，才引致「社稷傾覆，宗廟無主。」各方面意見，都聚焦於對孫皓獨裁、恐怖政治的聲討，認為這是吳亡的原因。⁴⁷

陸機在〈辨亡論〉中也談到吳之存亡的關鍵，「在德不在險」，⁴⁸ 不過他寫〈辨亡論〉，已經是在吳亡後的若干年，孫皓也已經在太康五年（285）死去，所以，他並沒有像薛瑩那樣，或者像晉武帝希望聽到的那樣，去直接批判孫皓個人，更沒有像陳壽那樣，甚而追究孫權的責任。畢竟孫、陸兩家是至親，他祖父陸遜（183-245）娶了孫策女兒，他父親陸抗是孫策外孫，而他哥哥陸景（250-280）又娶了孫皓妹妹，他們是這樣的關係。但他又確實為陸抗之後，再沒有人能替吳承擔大的責任，感到深深惋惜。他也不認為吳亡，只是孫皓失去其地位和權力，是他個人的損失，他還是視之為「邦家顛覆，宗廟為墟」，即祖先創下的偉業，一朝蕩盡。他這樣說一點不奇怪，因為他的兄長

⁴⁴ [晉]陳壽撰，〔南朝宋〕裴松之注，〈三嗣主傳〉，《三國志》，卷48，頁1178。

⁴⁵ [晉]陳壽撰，〔南朝宋〕裴松之注，〈薛綜傳·裴注〉，《三國志》，卷53，頁1256。

⁴⁶ [晉]陳壽撰，〔南朝宋〕裴松之注，〈薛綜傳·裴注〉，《三國志》，卷53，頁1256-1257。

⁴⁷ 裴注曰：「吳平後，晉侍中庾峻等問皓侍中李仁曰：『聞吳主披人面，別人足，有諸乎？』仁曰：『以告者過也。君子惡居下流，天下之惡皆歸焉。蓋此事也，若信有之，亦不足怪。……。』」[晉]陳壽撰，〔南朝宋〕裴松之注，〈三嗣主傳〉，《三國志》，卷48，頁1174。

⁴⁸ [晉]陳壽撰，〔南朝宋〕裴松之注，〈三嗣主傳〉，《三國志》，卷48，頁1182。

陸晏（?-280）、陸景，都是在保衛吳的戰役中死於晉軍之手，對於吳亡，他有很切實的生死與共之感。

其實在陸機以前，甚至是吳未亡前，關於吳的前途，吳人自己就有相當多分析。見於陳壽《三國志·吳書》的，便有如太子太傅賀劭（226-275）在上疏中，指出「自頃年以來，朝列紛錯，真偽相貿，上下空任，文武曠位，外無山嶽之鎮，內無拾遺之臣」，由此帶來的危害，首先造成「清流變濁，忠臣結舌」的政治空氣，其次是「法禁轉苛，賦調益繁」，壓迫得「人力不堪，家戶離散」、「父子相棄，叛者成行」。賀劭認為，要擺脫這一困境，只有「任賢」。他說「古之聖王，所以潛處重闈之內而知萬里之情」，靠的就是「任賢之功」，過去秦始皇「德化不修，法政苛酷，毒流生民，忠臣杜口」，才造成「一夫大呼，社稷傾覆」，漢到後來「一朝喪沒，君臣系頸，共為羈僕」，也是由於「任授失賢」。按他的主張，孫皓就應該像孫權創業時那樣，懂得「雖承天贊，實由人力也」的道理，學會「愛民養士」，以改善不良政治風氣。⁴⁹ 而華覈在寶鼎二年（267）的上疏中，如前引，已提出「（賈）誼之所欲痛哭，比今為緩，抱火臥薪之喻，於今而急」的警告，他認為比賈誼時代更容易引發危機的，在當時，主要是「胸背有嫌，首尾多難，乃國朝之厄會也」，這時正該「勉墾殖之業，為饑乏之救」，以應對「風塵不虞之變」，否則，「軍糧必乏，不待接刃，而戰士已困矣」，可是，孫皓卻不知死活地更營新宮，使「農守並廢」，所以，他苦口婆心地勸說道：「臣聞先王治國無三年之儲，曰國非其國，安寧之世戒備如此，況敵疆大而忽農忘畜。」⁵⁰

陸遜的族子陸凱（198-269），寶鼎元年（266）為左丞相，深得孫皓信任。他在蜀亡後，曾就「近者漢之衰末，三家鼎立，曹失綱紀，

⁴⁹ [晉]陳壽撰，〔南朝宋〕裴松之注，〈賀劭傳〉，《三國志》，卷65，頁1456-1459。

⁵⁰ [晉]陳壽撰，〔南朝宋〕裴松之注，〈華覈傳〉，《三國志》，卷65，頁1464-1467。

晉有其政」以及「劉氏與奪乖錯，賞罰失所，君恣意於奢侈，民力竭於不急，是以為晉所伐，君臣見虜」，也就是魏禪位於晉和蜀為晉所併的形勢作過分析，上疏表達他對「百姓所為煩苛，刑政所為錯亂」的吳的狀況的擔心，期望孫皓能夠了解民為國之根本，「民安則君安，民樂則君樂」，以實行「保國養民」的政策。⁵¹ 在上疏中，他也談到「當今內寵之臣，位非其人，任非其量，不能輔國匡時，羣黨相扶，害忠隱賢」的用人問題，建議「簡文武之臣」，提拔能「上助陛下，下拯黎民」的人。⁵² 而他所推薦「或清白忠勤，或姿才卓茂，皆社稷之楨幹，國家之良輔」的人中，⁵³ 就有賀劭、薛瑩、陸喜（?-?）、陸抗等。在傳為他最後的指責「孫皓不遵先帝」的上疏中，又既有對孫皓違背「有國以賢為本」原則而作的「先帝親賢，陛下反之」的評斷，也有落實到具體人事上的批評，如說：「先帝外仗顧、陸、朱、張，內近胡綜、薛綜，是以庶績雍熙，邦內清肅。今者外非其任，內非其人，陳聲、曹輔，鬥筭小吏，先帝之所棄，而陛下幸之。」⁵⁴

建衡二年（270），陸抗都督信陵、夷道、樂鄉、公安諸軍事，坐鎮樂鄉，這時他聽說「都下政令多闕」，便針對「議者所恃，徒以長川峻山，限帶封域」的僥倖心理，上疏指出：「此乃守國之末事，非智者之所先也。」⁵⁵ 他還明白提出「開國承家，小人勿用」的主張，並說這是歷史上的教訓，「春秋已來，爰及秦漢，傾覆之釁，未有不由斯者也」，希望孫皓「抑黜羣小」，而任用有教養、能自立的人，即「或冠冕之胄，少漸道教，或清苦自立，資能足用」，「隨才授職」，⁵⁶ 以使政治清明。鳳凰元年（272），他聽說薛瑩下獄，便上疏稱：「夫

⁵¹ [晉]陳壽撰，〔南朝宋〕裴松之注，〈陸凱傳〉，《三國志》，卷 61，頁 1400-1401。

⁵² [晉]陳壽撰，〔南朝宋〕裴松之注，〈陸凱傳〉，《三國志》，卷 61，頁 1402-1403。

⁵³ [晉]陳壽撰，〔南朝宋〕裴松之注，〈陸凱傳〉，《三國志》，卷 61，頁 1403。

⁵⁴ [晉]陳壽撰，〔南朝宋〕裴松之注，〈陸凱傳〉，《三國志》，卷 61，頁 1406。

⁵⁵ [晉]陳壽撰，〔南朝宋〕裴松之注，〈陸抗傳〉，《三國志》，卷 58，頁 1355。

⁵⁶ [晉]陳壽撰，〔南朝宋〕裴松之注，〈陸抗傳〉，《三國志》，卷 58，頁 1355-1356。

俊乂者，國家之良寶，社稷之貴資，庶政所以倫敘，四門所以穆清也」，請求原赦薛瑩。直到去世前，他都在對「今不務富國強兵，力農畜穀」，卻「窮兵黷武，動費萬計」提出警告，認為照此下去，「寇不為衰，而我已大病矣。」⁵⁷

在這些吳人的上疏中，早已就孫皓末年吳陷入的困境，包括經濟上的農業衰退，糧食儲備不足，軍事上的腹背受敵，人心渙散，政治上的權力集中於「羣小」之手，清流變濁，作了敏銳而深刻的分析。陸機在〈辨亡論〉中檢討吳之所以亡，他關於吳的弊政的認識，首先，當然來自於這些吳人的見解，陸凱、陸抗的言論，應該是他最熟悉的。賀劭上疏後，為孫皓所深恨，天冊元年（275）竟加殺害，他兒子賀循（260-319）被流放海濱，吳亡後才返回山陰鄉里，除陽羨、武康令，隨後在吳人顧榮（?-312）以及陸機、陸雲兄弟的推薦下，為晉太子舍人，⁵⁸ 可知對賀劭、賀循父子，陸機也並不陌生。但是，當陸機在吳亡後寫〈辨亡論〉的時候，他對於吳之弊政的檢討，還是略過了經濟衰落、軍事危機等，只是側重在政治這一個方面，政治方面，又是集中在「授任之才異」這一點。為什麼集中在這一點？

強調「群公既喪」後，在孫皓身邊，已無可「授任之才」，是吳亡的原因，這一判斷，與陸機出身江東大族，在〈辨亡論〉中稱他父祖都是吳的腹心股肱，並不是沒有關係。陸雲曾經說得很明白：「官人，國之所廢興也。」⁵⁹ 也曾經說得很自豪：「昔我先公，邦國攸興。」⁶⁰ 這代表了一種很重要的認知、認同，即既視忠臣、烈士為國之興廢的關鍵，也是對忠臣、烈士角色的自我認同。薛瑩在答晉武帝

⁵⁷ [晉]陳壽撰，[南朝宋]裴松之注，〈陸抗傳〉，《三國志》，卷 58，頁 1358-1359。

⁵⁸ [晉]陳壽撰，[南朝宋]裴松之注，〈賀劭傳·裴注〉，《三國志》，卷 65，頁 1459。《晉書·賀循傳》引著作郎陸機上疏薦賀循曰：「至於才望資品，循可尚書郎」。[唐]房玄齡等，《晉書》（北京：中華書局，1981年），卷 68，頁 1825。

⁵⁹ [晉]陸雲著，黃葵點校，〈嘲褚常侍〉，《陸雲集》，卷 6，頁 121。

⁶⁰ [晉]陸雲著，黃葵點校，〈答兄平原〉，《陸雲集》，卷 3，頁 49。

問時，說「大臣大將，無所親信，人人憂恐，各不自保，危亡之釁，實由於此」，⁶¹ 這番話裡也有這樣的意識。薛瑩的父親薛綜（?-243），在孫權時代為選曹尚書、太子少傅，他本人在孫皓初期也是選曹尚書，領少傅，陳壽稱他「為吳良臣」，⁶² 作為吳的良臣，他同樣認為孫皓不信任身邊的大臣大將，是吳亡的原因。而據陳壽《三國志·吳書》記載，在嘉禾五年（236）呂壹（?-238）典校文書後，步騭（?-247）上疏，就已經向孫權提出，要對「丞相顧雍、上大將軍陸遜、太常潘濬」網開一面，因為他們都是「心膂股肱，社稷之臣」。⁶³ 當時，張承（177-244）給呂岱（161-256）寫信，稱「昔旦、奭翼周，《二南》作歌，今則足下與陸子也」，⁶⁴ 也是將呂岱、陸遜比作周公（?-?）、召公（?-?）。而後陸遜為丞相，孫權在詔令中說：「昔伊尹隆湯，呂尚翼周，內外之任，君實兼之。」⁶⁵ 更是視陸遜為輔佐商湯的伊尹與輔佐周武王的呂（姜）尚（?-?）的合體。所以，在《三國志·吳書·陸遜傳》中，陳壽評價陸遜，就稱他「庶幾社稷之臣」，評論陸抗，也稱「可謂克構者」。⁶⁶ 這都說明在吳蜀十年的歷史中，陸機陸雲的「先公」曾起到極為關鍵的作用，這是吳人以及晉人的共識。

而從陳壽的記載中還可以看到，在使陸遜一戰成名的夷陵之役，陸遜當時是以右護軍、鎮西將軍奉命為大都督、假節，指揮朱然（182-249）、潘璋（171-234）、宋謙（?-?）、韓當（?-226）、徐盛（?-?）、鮮于丹（?-?）、孫桓（198-223）等五萬人迎戰劉備（161-223）的，起初，「諸將軍或是孫策時舊將，或公室貴戚，各自

⁶¹ [晉]陳壽撰，〔南朝宋〕裴松之注，〈薛綜傳·裴注〉，《三國志》，卷53，頁1257。

⁶² [晉]陳壽撰，〔南朝宋〕裴松之注，〈薛綜傳〉，《三國志》，卷53，頁1257。

⁶³ [晉]陳壽撰，〔南朝宋〕裴松之注，〈步騭傳〉，《三國志》，卷52，頁1239。

⁶⁴ [晉]陳壽撰，〔南朝宋〕裴松之注，〈呂岱傳〉，《三國志》，卷60，頁1386。

⁶⁵ [晉]陳壽撰，〔南朝宋〕裴松之注，〈陸遜傳〉，《三國志》，卷58，頁1353。

⁶⁶ [晉]陳壽撰，〔南朝宋〕裴松之注，《三國志》，卷58，頁1361。

矜持，不相聽從」，而陸遜並沒有太過責怪，直到打敗劉備，孫權向他問起「何以初不啟諸將違節度者」，他才回答道：「此諸將或任腹心，或堪爪牙，或是功臣，皆國家所當與共克定天下者。臣雖驚懼，竊慕相如、寇恂相下之義，以濟國事。」⁶⁷ 這說明他心裡是很明白所謂「腹心」、「爪牙」的重要，尤其是當他看到魏、蜀相繼建國，更清楚地意識到吳將來要建國，便離不開這些爪牙、功臣。

陸遜的這種意識，他特別看重能共克天下者，同時自覺承擔起吳之腹心的角色，這一點，對陸機有很深的影響，不僅表現在〈辨亡論〉，也見於他的另外一篇〈漢高祖功臣頌〉。⁶⁸ 〈漢高祖功臣頌〉寫了一群漢初功臣，這群人，是如《史記》所說「維高祖元功，輔臣股肱」，⁶⁹ 也是如《漢書》所說「自古帝王之興，曷嘗不建輔弼之臣所與共成天功者。」⁷⁰ 陸遜在建安末年上疏孫權，曾提出要給「荊州士人仕進或未得所」者以機會，「乞普加覆載抽拔之恩」，當時就舉過漢高祖（?-195 B.C.）、漢光武帝（5 B.C.-57 A.D.）的例子，說：「昔漢高受命，招延英異，光武中興，群俊畢至，苟可以熙隆道教者，未必遠近。」⁷¹ 使「群俊畢至」，是他對漢高、光武的高度稱讚，也是他對孫權的期許。而陸機在〈漢高祖功臣頌〉中讚揚漢初的「文武四充，漢祚克廣」，⁷² 也可以說是對他祖父稱許「漢高受命，招延英異，光武中興，群俊畢至」這一主題的發揮。

〈漢高祖功臣頌〉寫了蕭何（?-193 B.C.）、曹參（?-190 B.C.）等協助漢高祖「定天下安社稷」的三十一個功臣，以四言韻語，為他

⁶⁷ 〔晉〕陳壽撰，〔南朝宋〕裴松之注，〈陸遜傳〉，《三國志》，卷 58，頁 1347-1348。

⁶⁸ 〔梁〕蕭統編，〔唐〕李善等注，《六臣注文選》，卷 47，頁 887-895。

⁶⁹ 〔漢〕司馬遷著，〔劉宋〕裴駟集解，〔唐〕司馬貞索隱，〔唐〕張守節正義，〈太史公自序〉，《史記》，卷 130，頁 3304。

⁷⁰ 〔漢〕班固撰，〔唐〕顏師古注，〈高惠高後文功臣表〉，《漢書》，卷 16，頁 527。

⁷¹ 〔晉〕陳壽撰，〔南朝宋〕裴松之注，〈陸遜傳〉，《三國志》，卷 58，頁 1346。

⁷² 〔梁〕蕭統編，〔唐〕李善等注，《六臣注文選》，卷 47，頁 895。

們逐一作頌。陸雲在寫給陸機的信中，也提到過這一作品，稱「〈漢功臣頌〉甚美」。⁷³ 但劉勰《文心雕龍·頌贊》篇又唱反調，說：「陸機積篇，惟〈功臣〉最顯；其褒貶雜居，固末代之訛體也。」⁷⁴ 意思是它雖然堪稱陸機的名作，可既褒且貶的寫法，是違反了「頌」的體制。據摯虞（?-?）在〈文章流別論〉中給「頌」作的定義，即「古者聖帝明王功成治定，而頌聲興，於是史錄其篇，工歌其章，以奏於宗廟，告於鬼神」來看，⁷⁵ 標準的頌，當然應該是「褒德顯容」，而陸機卻在頌揚時，也寫到淮南王黥布（?-?）的「謀之不藏，舍福取禍」、韓王韓信（230-196 B.C.）的「人之貪禍，寧為亂亡」，變成了述歷史而有褒貶，所以，劉勰說它是頌的「訛體」。這當然是作為文論家劉勰的「偏見」，因為像〈漢高祖功臣頌〉這樣的寫法，在當時，已經有如楊戲（?-261）的〈季漢輔臣贊〉。楊戲於蜀延熙四年（241）撰成〈季漢輔臣贊〉，也是以四言韻文的方式，頌述劉備、諸葛亮（181-234）等蜀國君臣，後來收入陳壽的《三國志·蜀書·楊戲傳》，並成為陳壽撰寫《蜀書》的重要基礎。⁷⁶ 它名之曰「贊」，與史傳的關係以及它本身述史的性質都很明顯，可在寫法上，卻是「約文以總錄，頌體以論辭」，⁷⁷ 早已實踐了「贊」與「頌」兩種文體的功能互借。這也就是說在實際寫作中，作為歷史評論的贊，既可採用頌的四言韻語的體制，而頌，在陸機筆下，也可以像歷史評論的贊一樣，「褒貶雜居」。

劉知幾（661-721）《史通》載《晉令》稱「著作郎掌起居集注，撰錄諸言行動伐舊載史籍者」，⁷⁸《晉書·職官志》也記「著作郎始到

⁷³ 〔晉〕陸雲著，黃葵點校，《陸雲集》，卷8，頁137。

⁷⁴ 〔梁〕劉勰著，范文瀾注，《文心雕龍注》，卷2，頁158。

⁷⁵ 嚴可均校輯，《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北京：中華書局，1985年），卷77，頁1905。

⁷⁶ 〔晉〕陳壽撰，〔南朝宋〕裴松之注，《三國志》，卷45，頁1079。

⁷⁷ 〔梁〕劉勰著，范文瀾注，〈頌贊〉，《文心雕龍注》，卷2，頁158。

⁷⁸ 〔唐〕劉知幾著，〔清〕浦起龍通釋，王煦華整理，〈史官建置〉，《史通通釋》（上海：上海

職，必撰名臣傳一人。」⁷⁹ 據此推測，〈漢高祖功臣頌〉大約作於陸機任著作郎時，是他根據《史記·太史公自序》、《漢書·敘傳》對各篇的介紹，而就三十一名漢初功臣寫類似於歷史評論的頌。⁸⁰ 其史料來源，主要是《史記》中的〈高祖功臣侯者年表〉、〈漢興以來將相名臣年表〉及《漢書》中的〈高惠高後孝文功臣侯表〉等，而大部分的評價，也都基於司馬遷（約 140 B.C.-?）、班固（32-92）的歷史敘述及史觀，即所謂「賢相良將，民之師表」，又所謂「孝平不造，新都作宰，不周不伊，喪我四海」，⁸¹ 班固就說過漢高祖時有很多功臣，而到西漢末年，因為少了周公、伊尹那樣的人物，便「喪我四海」。陸機在他出任晉的著作郎時，重拾這一話題，不僅因為他入了著作局，這是職責所在，還因為寫這一題材也正吻合他此時的心情，暗示他已經做好了為晉之股肱、爪牙的準備。陸機為著作郎，是在元康八年（298）前後，⁸² 就在這一期間，恰好陸雲為太子舍人，因「見史臣班固撰錄聖功」，也就是讀了班固在《漢書》裡寫的漢高祖的豐功偉業，深受啟發，便作了一篇〈盛德頌〉獻給晉惠帝（259-307），以

古籍出版社，2010年），卷11，頁296。

⁷⁹ 〔唐〕房玄齡等，《晉書》，卷24，頁735。周一良（1913-2001）認為這是測試之意，見周一良，〈魏晉南北朝史學發展的特點〉，《魏晉南北朝史論》（瀋陽：遼寧教育出版社，1998年），頁472。

⁸⁰ 《史通·論贊》：「馬遷〈自序〉傳後，歷寫諸篇，各敘其意（在〈自序〉之後，文仍散體）。既而班固變為詩體，號之曰述（在〈序傳〉之後，文皆四言）。范曄改彼述名，呼之以贊。」參見〔唐〕劉知幾著，浦起龍通釋，王煦華整理，《史通通釋》，卷4，頁77。

⁸¹ 〔漢〕司馬遷著，〔劉宋〕裴駟集解，〔唐〕司馬貞索隱，〔唐〕張守節正義，〈太史公自序〉，《史記》，卷130，頁3304；〔漢〕班固撰，〔唐〕顏師古注，〈敘傳下〉，《漢書》，卷100，頁4240。

⁸² 陸機〈吊魏武帝文序〉曰：「元康八年，機始以臺郎出補著作。」〔晉〕陸機著，金濤聲點校，《陸機集》（北京：中華書局，1982年），卷9，頁115。參見陸侃如，《中古文學系年》（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5年），頁771；牛潤珍，《漢至唐初史官制度的演變》（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1999年），頁105、117-118。

謳歌皇帝陛下的「聖德豐化，比隆前代」。⁸³ 當此時，他們兄弟二人似乎都有意借漢初故事，來傳達他們對於新朝的效忠。也正是在這樣的心情之下，在獻給大將軍成都王穎的一首詩裡，陸雲才寫下「開國承家，勿用小人」的勸誡，⁸⁴ 表現出對大將軍之事業的高度認同，而在寫給吳人朋友的信裡，則又說「吳國初祚，雄俊尤盛。今日雖衰，未皆下華夏也」，⁸⁵ 以鞭策鄉人勇敢地踏進新朝政治。

在陸機為著作郎期間，圍繞晉的歷史應該從何寫起，於洛陽再展開一次新的討論，即所謂「議《晉書》限斷」。⁸⁶ 爭論的焦點，在於寫晉史，是應該從晉武帝泰始之年開始，還是應該從魏齊王芳的正始之年或嘉平之年開始。⁸⁷ 陸機有一個看法，在這次討論中顯然受到重視，主持其事的賈謐（？-300）還特意找來束皙（？-300），以「難陸士衡『晉書限斷』」。⁸⁸ 據陸機現存四十四個字的《晉書限斷議》說：「三祖實終為臣，故書為臣之事，不可（不）如傳，此實錄之謂也。」

⁸³ [晉]陸雲著，黃葵點校，《陸雲集》，卷6，頁111-114。其中稱「晉太子舍人陸雲」，案，據《世說新語》劉孝標注引《陸雲別傳》，其為太子舍人，在永寧元年（301）為清河內史前，當是元康末年。〔南朝宋〕劉義慶著，余嘉錫箋疏，周祖謨等整理，〈賞譽〉，《世說新語箋疏》（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頁432。

⁸⁴ [晉]陸雲著，黃葵點校，〈從事中郎張彥明為中護軍奚世都為汲郡太守各將之官大將軍崇賢之德既遠而厚下之恩又隆悲此離析有感聖皇顯崇既蒙引見又宴於後園感鹿鳴之宴樂詠魚藻之凱歌而作是詩〉，《陸雲集》，卷2，頁41。

⁸⁵ [晉]陸雲著，黃葵點校，〈與陸典書書〉，《陸雲集》，卷10，頁171。

⁸⁶ 《初學記·著作郎·事對》「議限斷」條：「陸士衡以文學為秘書監虞濬所請，為著作郎，議《晉書》限斷」。〔唐〕徐堅等，《初學記》（北京：中華書局，1980年），卷12，頁299。

⁸⁷ 《晉書·賈謐傳》：「先是，朝廷議立晉書限斷，中書監荀勗調宜以魏正始起年，著作郎王瓚欲引嘉平已下朝臣盡入晉史，于時依違未有所決。惠帝立，更使議之，謐上議，請從泰始為斷。」〔唐〕房玄齡等，《晉書》，卷40，頁1174。參見周一良，〈魏晉南北朝史學與王朝禪代〉，《魏晉南北朝史論》，頁520-533。

⁸⁸ 《初學記·著作郎·事對》「難限斷」條引《晉紀》曰：「束皙字廣微，秘書監賈謐請為著作郎，難陸士衡晉書限斷。」〔唐〕徐堅等，《初學記》，卷12，頁299。

而名同帝王，故自帝王之籍，不可以不稱紀，則追王之義。」⁸⁹ 他的意思是，司馬懿（179-251）、司馬師（208-255）、司馬昭（211-265）父子三人終身為臣，寫臣理應用「傳」，可是他們卻都封了王，⁹⁰ 咸寧元年（275）已追尊為高祖、世宗、太祖，⁹¹ 既有帝王之名，便也要用「紀」的名義。周一良曾指出這是肯定了司馬懿父子三人應該入晉史，但在晉史中，是當作「傳」還是「紀」來寫，陸機「語氣模稜」。⁹² 但現在從陸機撰寫晉書，⁹³ 採取的是「列紀三祖，直序其事，竟不編年」的辦法來看，⁹⁴ 與其說他語氣模糊，不如說他還是用自己的實踐，克服了晉書編寫中實錄與追述即「追王之義」的矛盾。

既照顧到「紀傳體」史書的編纂原則，卻又能靈活變通，這也不始於陸機。在吳，孫皓即位後，便向左國史韋昭提出過「為父（孫）和作紀」的要求，但是遭韋昭拒絕，理由是孫和「不登帝位」，只能以「傳」的形式寫進吳史。⁹⁵ 因此，當陸機後來參加議晉書限斷，提

⁸⁹ 〔唐〕徐堅等，〈史傳·事對·王籍〉，《初學記》，卷 21，頁 503。

⁹⁰ 據《三國志·魏志·三少帝陳留王紀》載，咸寧元年（264）三月，進晉公爵為王，五月追命舞陽宣文侯為晉宣王、舞陽忠武侯為晉景王。〔晉〕陳壽撰，〔南朝宋〕裴松之注，《三國志》，卷 4，頁 150。

⁹¹ 〔唐〕房玄齡等，〈武帝紀〉，《晉書》，卷 3，頁 65。

⁹² 周一良，〈魏晉南北朝史學與王朝禪代〉，《魏晉南北朝史論》，頁 523。

⁹³ 《隋書·經籍志·二》著錄陸機撰《晉紀》四卷。〔唐〕魏徵等，〈經籍志〉，《隋書》（北京：中華書局，1981 年），卷 33，頁 958。《史通·古今正史》稱「晉史，洛京時，著作郎陸機始撰《三祖紀》」參見〔唐〕劉知幾著，浦起龍通釋，王煦華整理，《史通通釋》，卷 12，頁 324。湯球輯陸機撰《晉紀》一卷，見〔清〕湯球撰，黃奭輯，喬治忠校注，《眾家編年體晉史》（天津：天津古籍出版，1989 年）。

⁹⁴ 《史通·本紀》：「蓋紀之為體，猶《春秋》之經，繫日月以成歲時，書君上以顯國統……而陸機《晉書》，列紀三祖，直序其事，竟不編年。年既不編，何紀之有？」〔唐〕劉知幾著，浦起龍通釋，王煦華整理，《史通通釋》，卷 2，頁 34。

⁹⁵ 〔晉〕陳壽撰，〔南朝宋〕裴松之注，〈韋昭傳〉，《三國志》，卷 65，頁 1462。參見劉知幾，《史通·本紀》：「是以弘嗣吳史，不紀孫和，緬求故實，非無往例」。〔唐〕劉知幾著，浦起龍通釋，王煦華整理，《史通通釋》，卷 2，頁 34。

出三祖「不可不如傳」寫的主張，⁹⁶ 在這方面，他並非沒有可資借鑑的案例，至少在同鄉前輩韋昭這裡，他就看到過有這樣的原則。更何況，在他已經讀到的陳壽《三國志·魏書》裡，也並沒有為司馬懿父子列傳，說明在陳壽的意識中，也是將他們歸入晉史。同時，陳壽在《三國志·吳書》中寫〈吳主傳〉、〈三嗣主傳〉，在《三國志·蜀書》中寫〈先主傳〉、〈後主傳〉，又是採取了用吳、蜀的紀年，卻名之以「傳」的辦法，也就是劉知幾後來評論所說「陳壽國志載孫、劉二帝，其實紀也，而呼之曰傳」，⁹⁷ 換句話說，就是陸機在陳壽這裡也看到了一種變通，即用「紀」的方式寫「傳」，以表明孫權、劉備等雖享帝王之實，但不該有帝王的名分。在看到這些變通之後，他也有了他在晉書裡名之為「紀」卻不紀年的辦法。

三、晉史與《吳書》

任著作郎期間，陸機一面參加《晉書》的修纂，據陸雲寫給他的信，可以推斷他同時也在做著編寫《吳書》的計畫，並將已經寫出的部分交給陸雲，讓陸雲核定。陸雲〈與兄平原書〉現存約三十二封，其中有四封都談到《吳書》，足以證明這是他們在某一時間段內經常談論的話題。除了前引「欲誨定《吳書》」一封，在另外幾封信裡，陸雲這樣寫道：

《吳書》是大業，既可垂不朽，且非兄述，此一國事，遂亦失。兄諸列人皆是名士，不知姚公足為作傳不？可著儒林中耳。不大識唐子正事，愚謂常侍便可連於尚書傳下。書定自難。雲少

⁹⁶ 《文心雕龍·史傳》說：「至於晉代之書，繁乎著作，陸機肇始而未備，王韶續末而不終。」〔梁〕劉勰著，范文瀾注，《文心雕龍注》，卷4，頁285。

⁹⁷ 〔唐〕劉知幾著，浦起龍通釋，王煦華整理，〈列傳〉，《史通通釋》，卷2，頁42。

作書，至今不能令成，日見其不易。

彼見人讚敘者，當與令伯論吳百官次第、公卿名伯，略盡識，少交當具。頃作頌，及吳事，有愴然。且公傳未成，諸人所作，多不盡理。兄作之公私並敘，且又非常業。從雲，兄來作之。今略已成，甚復可惜，事少，功夫亦易耳。

義高家事，正當付令文耳。弟彥長昔作《吳事》，云三十卷，可令欽求。⁹⁸

「《吳書》是大業」一封，開頭強調《吳書》的編寫極為重要，重申這是可垂不朽的大業，而非陸機，其他人都不可能寫好。接下來，便是就陸機開列的名單，談這些名士傳的具體寫法。第一，問姚公是否夠立傳的資格，如果夠資格，建議放進儒林傳。這裡提到的姚公即姚信（?-?），是陸遜外甥，長陸機、陸雲一輩，曾為孫和（224-253）屬下，孫和廢太子，他也遭流徙，至孫皓即位，召太常卿。姚信在陳壽《三國志·吳書》中並無專傳，事蹟散見於〈陸遜傳〉、〈孫和傳〉、〈陸凱傳〉等。第二，表示不熟悉唐子正（?-?）的情況。唐固字子正，⁹⁹ 據陳壽《吳書·闕澤傳》附載，可知他是會稽山陰闕澤的州里前輩，而闕澤已如前述，正是向孫權推薦賈誼〈過秦論〉的人。陳壽記唐固「修身積學，稱為儒者，著《國語》、《公羊》、《穀梁傳》注，講授常數十人。權為吳王，拜固議郎，自陸遜、張溫、駱統等皆拜之。黃武四年為尚書僕射，卒」，¹⁰⁰ 文字不多，可是輪廓已

⁹⁸ [晉]陸雲著，黃葵點校，《陸雲集》，卷8，頁143-144。

⁹⁹ 《三國志·闕澤傳》裴注引《吳錄》曰：「固字子正，卒時年七十餘矣。」[晉]陳壽撰，〔南朝宋〕裴松之注，《三國志》，卷53，頁1250。並見韋昭《國語解敘》：「建安、黃武之間，故侍御史會稽虞君、尚書僕射丹陽唐君皆英才碩儒，洽聞之士也，采摭所見，因賈為主而損益之。觀其辭義，信多善者，然所理釋，猶有異同。」上海師範大學古籍整理研究所校點，《國語》（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冊下，頁661。

¹⁰⁰ [晉]陳壽撰，〔南朝宋〕裴松之注，《三國志》，卷53，頁1250。

清晰，陸雲卻稱對他不熟悉，大概是沒有除此之外的更多瞭解。第三，建議將常侍傳附在尚書傳下。常侍、尚書顯然是指兩個特定的人，最有可能代指尚書僕射薛綜、散騎中常侍薛瑩這一對父子，因為在陳壽撰《吳書》裡，恰好就是闕澤、薛綜同傳，唐固附見於闕澤傳，薛瑩傳則附在薛綜傳下，¹⁰¹ 從唐固說到薛綜父子，順理成章。而松本幸男（1926-1983）認為常侍當指晉散騎常侍陸喜，尚書指吳選曹尚書陸瑁，陸瑁是陸喜父親，又是陸遜弟，¹⁰² 在陳壽《吳書》也中有傳，¹⁰³ 他的這個說法，也可以成立。總之，陸雲是說這父子二人應該同傳。

「彼見人讚敘者」這封信，首先談到署名韋昭撰的《吳書》中，有薛瑩補寫的贊敘。《吳書》的修纂，自孫權太元元年（251）由官方出面組織，在吳時就啟動過四次。¹⁰⁴ 起初是由丁孚（?-?）、項峻（?-?）負責，但這兩人「俱非史才，其所撰作，不足記錄」，所以在建興元年（252），孫亮又令韋昭率華覈、薛瑩、周昭（?-261）、梁廣（?-?）五人共撰。但就在韋昭等人「訪求往事，所共撰立，備有本末」時，不幸周昭、梁廣去世，韋昭「負恩蹈罪」，薛瑩也出為武昌左部督且涉案下獄，¹⁰⁵ 因而再度擱置。鳳凰二年（273），華覈為救韋昭出獄，上疏稱「《吳書》雖已有頭角，敘贊未述」，「非得良才如（韋）昭者，實不可使闕不朽之書」，¹⁰⁶ 未能如願，他又請求

¹⁰¹ 〔晉〕陳壽撰，〔南朝宋〕裴松之注，〈張嚴程闕薛傳〉，《三國志》，卷 53，頁 1249-1256。

¹⁰² 〔日〕松本幸男，〈陸雲〈與平原書〉譯注（二）〉，《學林》第 26 號（京都：中國芸文研究會，1997 年），頁 155。

¹⁰³ 〔晉〕陳壽撰，〔南朝宋〕裴松之注，《三國志》，卷 57，〈陸瑁傳〉，頁 1336-1338，其下附有〈陸喜傳〉。

¹⁰⁴ 參見牛潤珍，《漢至唐初史官制度的演變》，頁 95。

¹⁰⁵ 〔晉〕陳壽撰，〔南朝宋〕裴松之注，〈薛綜傳〉，《三國志》，卷 53，頁 1255-1256；又，周昭死於孫休時，見〈步騭傳〉，卷 52，頁 1242。

¹⁰⁶ 〔晉〕陳壽撰，〔南朝宋〕裴松之注，〈韋曜傳〉，《三國志》，卷 65，頁 1464。

從廣州召回有「記述之才」的薛瑩，「使卒垂成之功」，這樣，薛瑩才被召回，為左國史，¹⁰⁷ 至太康三年（283）去世。所以，儘管《隋書·經籍志》著錄「《吳書》二十五卷，韋昭撰」，¹⁰⁸ 劉知幾也說《吳書》係「曜（昭）獨終其書，定為五十五卷」，¹⁰⁹ 但是根據牛潤珍的研究，華覈在上疏中提到《吳書》的「敘贊未述」，那些敘贊，後來還是由薛瑩補寫完成。¹¹⁰ 而當薛瑩身陷牢獄時，鳳凰元年，陸抗也曾上疏「乞垂天恩，原赦瑩罪」，¹¹¹ 這時陸機、陸雲差不多十歲左右，對韋昭等編纂《吳書》以及薛瑩補寫《吳書》敘贊的前後經過，不管是當時還是事後，很有可能知情。陸雲在這裡提到「彼見人讚敘者」，就是指他看到了由薛瑩補寫的《吳書》贊敘。接下來，「令伯論吳百官次第、公卿名伯」中的令伯，當是人名，而據現有材料，可知當時有蜀人李密（224-287），字令伯。有文獻記載李密曾作為蜀的使者，到訪吳，蜀亡後，先是以太子洗馬徵召入洛陽，後為溫令、漢中太守，¹¹² 他和陳壽都為蜀之碩儒譙周（199-270）的弟子，¹¹³ 但不能確定他是否記錄過吳的百官公卿。陸雲的意思是，他們要看過薛瑩寫的《吳書》贊敘、令伯記的吳百官公卿，並作筆記，以備參考。這顯然是在為大規模修史做準備，薛瑩撰寫《吳書》贊敘，對他們而言，就好像陳壽寫《三國志·蜀書》時曾經利用過的楊戲〈季漢輔臣贊〉，而陸機當時也在編《晉惠帝百官名》，¹¹⁴ 對有關吳的百官公卿的記

¹⁰⁷ 〔晉〕陳壽撰，〔南朝宋〕裴松之注，〈薛綜傳〉，《三國志》，卷 53，頁 1256。

¹⁰⁸ 〔唐〕魏徵等，〈經籍志〉，《隋書》，卷 33，頁 955。

¹⁰⁹ 〔唐〕劉知幾著，浦起龍通釋，王煦華整理，〈古今正史〉，《史通通釋》，卷 12，頁 322。

¹¹⁰ 牛潤珍，〈漢至唐初史官制度的演變〉，頁 95-96。

¹¹¹ 〔晉〕陳壽撰，〔南朝宋〕裴松之注，〈陸抗傳〉，《三國志》，卷 58，頁 1359。

¹¹² 〔晉〕陳壽撰，〔南朝宋〕裴松之注，〈楊戲傳〉，《三國志》，卷 45，頁 1078。

¹¹³ 《晉書·李密傳》：「李密『師事譙周，周門人方之游夏』。」〔唐〕房玄齡等，《晉書》，卷 88，頁 2274。

¹¹⁴ 陸機撰《晉惠帝百官名》三卷，見於〔後晉〕劉昫等，〈經籍志〉，《舊唐書》（北京：中華書局，1975年），卷 46，頁 1999；〔宋〕歐陽修、宋祁，〈藝文志〉，《新唐書》（北京：中華

述，當然也很敏感。信的後面，陸雲說到自己最近在寫〈祖考頌〉，祖指的是「烈祖丞相邵侯」陸遜，考指的是「顯考大司馬武侯」陸抗，¹¹⁵ 因為涉及吳的歷史，陸雲說他一邊寫一邊有悲愴之感。而信寫到這裡，他又在此強調陸遜、陸抗的傳，只有陸機才能寫好，才可得「公私並敘」之長，也就是在保存吳國歷史的同時，彰顯陸氏家族的榮光，因此他又鼓勵陸機，一定要寫出《吳書》，以「垂不朽」。

「義高家事」，所指不明。「正當付令文耳」，令文，或指顧令文（?-?），見於陸機詩〈贈顧令文為宜春令〉、陸雲詩〈答大將軍祭酒顧令文〉。¹¹⁶「弟彥長」，當指令文弟。陸雲又有〈與張光祿書〉曰：「顧令文彥先每宣隆眷彌泰之惠。」¹¹⁷ 彥先，疑即顧榮字彥先，是顧雍（168-243）孫。由此推測令文、彥長都是顧榮兄弟，亦即吳郡顧氏後人，其中彥長寫有講述吳國歷史的《吳事》三十卷，陸雲他們很希望能夠看到，以備參考。

遼欽立（1910-1973）考證以上陸雲寫的幾封信，都作於永寧元年到太安二年（303）之間，¹¹⁸ 也就是在陸機遷著作郎之後。陸機在著作郎任上大約一年多，至永康元年（300）四月，便轉為趙王倫（249-301）相國參軍，不意捲入「八王之亂」，先是為趙王倫所用，後委身成都王穎（279-306），至太安二年冬奉命征討長沙王又

書局，1975年），卷58，頁1476。案：《魏書·臧霸傳·裴注》曰霸子舜，「晉散騎常侍，見《武帝百官名》。此《百官名》，不知誰所撰也，皆有題目，稱舜『才穎條暢，識贊時宜』也。」〔晉〕陳壽撰，〔南朝宋〕裴松之注，《三國志》，卷18，頁538。於此亦可見《百官名》體例。

¹¹⁵ 〔晉〕陸雲著，黃葵點校，《陸雲集》，卷6，頁117。

¹¹⁶ 〔晉〕陸機著，金濤聲點校，《陸機集》，補遺，頁159；〔晉〕陸雲著，黃葵點校，《陸雲集》，卷3，頁75。

¹¹⁷ 〔晉〕陸雲著，黃葵點校，《陸雲集》，卷10，頁163。

¹¹⁸ 遼欽立，〈《文賦》撰出年代考〉，原載《學原》第二卷第一期，1948年。轉引自遼欽立，《遼欽立文存》（北京：中華書局，2010年），頁445-456。

(275-304)，兵敗被殺，導致陸雲也受牽連遇害，¹¹⁹ 他自太康末年入晉，與世事相沉浮，在人生的最後三、四年，陷入新朝政治鬥爭的漩渦，動盪不定，恐怕再沒有可能繼續修纂《吳書》。《吳書》的編寫，因此可以大體判斷就是在元康八年到永康元年之間，前前後後持續了大約四、五年。

陸機、陸雲都出生在吳的孫休時代，也就是〈辨亡論〉所說「景皇帝孫休，度修遺憲，政無大闕，守文之良主也」的那樣一個時期。景皇帝孫休「銳意於典籍，欲覽遍百家之言」，又喜歡和韋昭等學者在一起「講論道藝」，¹²⁰ 很有些書生氣。而從他父親孫權時代起，吳就異常重視歷史的學習和教育。據說孫權的特點，便是「博覽書傳歷史，籍采奇異，不效諸生尋章摘句」，他總結自己的讀書經驗，也是說：「少時曆《詩》、《書》、《禮記》、《左傳》、《國語》，唯不讀《易》。至統事以來，省三史、諸家兵書，自以為大有所益。」¹²¹ 不知是不是因為他特別看重歷史的緣故，他母親最早為他所聘會稽謝夫人，謝夫人的兄弟謝承（?-?），後來就撰有《後漢書》百餘卷。¹²² 他勸呂蒙（178-220）、蔣欽（168-219）讀書，給他們的建議，也是「宜急讀《孫子》、《六韜》、《左傳》、《國語》及三史」，而不必讀經，「孤豈欲卿治經為博士邪？但當令涉獵見往事耳！」由此，當呂蒙學問漸長，得到魯肅（172-217）「士別三日，即更刮目相待」的誇獎時，因為他讀的主要為史書、兵書，與漢代儒生的知識系統相當不同，所以「其所覽見，舊儒不勝。」¹²³

孫權反覆提到的「三史」，指的是司馬遷的《史記》、班固的《漢

¹¹⁹ 〔唐〕房玄齡等，〈陸機傳〉，《晉書》，卷 54，頁 1474-1480。

¹²⁰ 〔晉〕陳壽撰，〔南朝宋〕裴松之注，〈三嗣主傳〉，《三國志》，卷 48，頁 1159。

¹²¹ 《三國志·吳書·吳主傳》裴注引《吳書》記趙諮對曹丕問。見〔晉〕陳壽撰，〔南朝宋〕裴松之注，《三國志》，卷 47，頁 1123-1124。

¹²² 〔晉〕陳壽撰，〔南朝宋〕裴松之注，〈妃嬪吳主權謝夫人傳〉，《三國志》，卷 50，頁 1196。

¹²³ 〔晉〕陳壽撰，〔南朝宋〕裴松之注，《三國志》，卷 54，頁 1274。

書》與劉珍（?-?）、劉毅（?-?）等人的《漢記》，這三史在吳都頗為流行，《隋書·經籍志》著錄有張溫（193-230）撰《三史略》，¹²⁴ 應當就是這三史的節本。張溫是吳郡吳人，¹²⁵ 為太子太傅，《三史略》大概是他替太子孫登（209-241）編的三史讀本，而這個簡要讀本的出現，表明三史被當成教材，已有了相當的需求量。這就像在建安初期，荀悅（148-209）「被詔刪《漢書》作《漢紀》三十篇」，而由於《漢紀》敘事簡明，頗有「因事以明臧否」的特點，故「其書大行於世」，¹²⁶ 由此也推動《漢書》更加普及。從漢末司馬懿父親司馬防（149-219）「雅好《漢書》名臣列傳，所諷誦者數十萬言」的記載看，¹²⁷ 確如吉川忠夫的研究所說，在這個時代，《漢書》的地位，已幾乎等同於經書。¹²⁸ 這就是為什麼在劉備的遺詔中，有對劉禪（207-271）「可讀《漢書》、《禮記》，閒暇曆觀諸子及《六韜》、《商君書》」的要求。¹²⁹ 而孫登立太子，孫權對他的要求，也是讀《漢書》，以「習知近代之事」。孫權還看中了張昭（156-236）曾隨白侯子安（?-?）學《左氏春秋》，¹³⁰ 學有師承，囑咐張昭之子張休（205-245）

¹²⁴ 張溫撰《三史略》二十九卷，見〔唐〕魏徵等，《隋書》，卷33，頁961。

¹²⁵ 據《三國志·吳書·陸績傳》並裴注，張溫弟張白，娶同郡陸績女，陸績是陸康子，而小陸康從孫陸遜數歲，遂由陸遜綱紀門戶。陸康博學多識，孫權時出為郁林太守，而著述不廢。〔晉〕陳壽撰，〔南朝宋〕裴松之注，《三國志》，卷57，頁1328-1329。

¹²⁶ 《三國志·荀彧傳》裴注引張璠《漢紀》。〔晉〕陳壽撰，〔南朝宋〕裴松之注，《三國志》，卷10，頁316；《隋志》也著錄荀悅撰《漢紀》三十卷。〔唐〕魏徵等，《經籍志》，《隋書》，卷33，頁957。

¹²⁷ 《三國志·魏書·司馬朗傳》裴注引司馬彪《序傳》。〔晉〕陳壽撰，〔南朝宋〕裴松之注，《三國志》，卷15，頁466。案，司馬防是司馬懿父親，死於建安二十四年（219），年七十一。

¹²⁸ 〔日〕吉川忠夫著，王啟發譯，《顏師古的《漢書注》》，《六朝精神史研究》（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12年），頁241。

¹²⁹ 《三國志·蜀書·先主傳》裴注引《諸葛亮集》載先主遺詔敕後主。〔晉〕陳壽撰，〔南朝宋〕裴松之注，《三國志》，卷32，頁891。

¹³⁰ 〔晉〕陳壽撰，〔南朝宋〕裴松之注，《張昭傳》，《三國志》，卷52，頁1219。

先向他父親問學，然後轉授孫登，¹³¹ 由此，張休講《漢書》，也能「指摘文義，分別事物，並有《章條》」。¹³² 據顏師古〈漢書敘例〉，還可知漢末至三國間為《漢書》作注的，先後有荀悅、服虔（?-?）、應劭（?-?）、伏儼（?-?）、劉德（?-?）、鄭氏、李斐（?-?）、李奇（?-?）、鄧展（?-?）、文穎（?-?）、張揖（?-?）、蘇林（?-?）、張晏（?-?）、如淳（?-?）、孟康（?-?）、項昭（?-?）等十幾家，吳人韋昭也是其一。¹³³

陸機兄陸景的母親，即為張昭孫女、張承女兒。¹³⁴ 張承「少以才學知名」，¹³⁵ 在〈辨亡論〉中，是與諸葛瑾（174-241）、步騭並列的「以名聲光國」的風雅人物，給孫登講授《漢書》的張休，是他弟弟。於此可見陸機兄弟的史學修養，既是得益於吳有重視歷史學習和教育的傳統，也來自他們母親的家族。¹³⁶ 陸雲的熟讀《漢書》，陸機

¹³¹ 《三國志·吳書·吳主五子孫登傳》：「以張昭有師法，重煩勞之，乃令休從昭受讀，還以授登。」〔晉〕陳壽撰，〔南朝宋〕裴松之注，《三國志》，卷 59，頁 1363。

¹³² 《三國志·吳書·張昭傳》注引《吳書》。〔晉〕陳壽撰，〔南朝宋〕裴松之注，《三國志》，卷 52，頁 1225。姚振宗，《三國藝文志·史之類》著錄有「張休《漢書章條》，以為『《吳書》言『並有條章』，則非徒憑口說，其必筆之於書。可知顏師古〈漢書敘例〉載晉劉寶（?-301）侍皇太子講《漢書》，別有《駁議》，即此之類，亦略如後世講義。（凡歷朝臣工進講，皆別具講義，知此制自魏晉已然矣。）而張子布父子《漢書》有師法亦於此見之。」〔清〕姚振宗著，朱莉莉整理，《三國藝文志》，收入王承略、劉心明主編，《二十五史藝文經籍志考補萃編》（北京：清華大學出版社，2012年），第九卷，頁 166。

¹³³ 〔漢〕班固撰，〔唐〕顏師古注，《漢書》，頁 2-3。案，《隋志》著錄除韋昭撰《漢書音義》，尚有應劭撰《漢書集解音義》二十四卷、服虔撰《漢書音訓》一卷。〔唐〕魏徵等，《隋書》，卷 33，頁 953。

¹³⁴ 《三國志·吳書·陸抗傳》裴注引《文士傳》曰：「陸景母張承女，諸葛格外生。格誅，景母坐見黜。景少為祖母所育養，及祖母亡，景為之心喪三年。」〔晉〕陳壽撰，〔南朝宋〕裴松之注，《三國志》，卷 58，頁 1360。案，諸葛恪（203-253）之誅在孫亮執政的建興二年（253）。

¹³⁵ 《三國志·吳書·張昭附張承傳》。〔晉〕陳壽撰，〔南朝宋〕裴松之注，《三國志》，卷 52，頁 1224。

¹³⁶ 〔晉〕陸雲著，黃葵點校，〈張二侯頌〉，《陸雲集》，卷 6，頁 117-119。二侯，指文侯張昭、

之參與賈謐召集的《漢書》講讀，¹³⁷ 並在〈五等諸侯論〉中表現出他對歷史尤其是秦漢史的深入了解，¹³⁸ 又寫出〈漢高祖功臣頌〉，都不是偶然的。為修纂國史而設著作郎，始於魏明帝，在吳，孫皓時也設有相應的官職，稱左右國史。¹³⁹ 劉知幾曾說魏晉以來，著作郎的人選，都要「才堪撰述，學綜文史」，而華嶠（?-293）、陳壽、陸機、束皙這幾位，都是西晉時代的「史官之尤美，著作之妙選」。¹⁴⁰ 陸機入晉後之所以能為著作郎，參與到晉史的官方修纂，一如在他之前進入著作局的來自蜀國的陳壽，當然是因為他首先已經具備了這樣的條件。

吳自孫權末啟動官修國史，到吳亡後，仍然有吳人在繼續編纂本國史，有文獻可考的，第一是周處（236-297）。周處是吳郡陽羨人，他父親周魴（?-?）曾隨陸遜大破曹休（?-228），他自己在吳的天紀（277-280）年間做東觀令、無難督，¹⁴¹ 吳亡後，據說晉將軍王渾（223-297）登建鄴宮嘲諷吳人：「諸君亡國之餘，得無感乎？」只有周處回答：「漢末分崩，三國鼎立，魏滅於前，吳亡於後，亡國之感，豈惟一人！」話說得不卑不亢，可是周處內心無比悲憤，於是「撰集

定侯張承。

¹³⁷ 《北堂書鈔·談講十三》「講學秘館」條引陸機《講漢書詩》云：「稅駕金華，講學秘館，有集惟髦，芳風雅宴。」〔唐〕虞世南輯，《北堂書鈔》（北京：中國書店 1989 年影印光緒十四年〔1888〕南海孔廣陶本），卷 98，頁 372。參見潘岳〈於賈謐坐講漢書〉：「前疑既辯，舊史惟新。惟新爾史，既辯爾疑。延我僚友，講此微辭。」遼欽立編，《先秦漢魏晉南北朝詩》（北京：中華書局，1980 年），晉詩，卷 4，頁 631。《晉書·賈謐傳》記賈謐「起為秘書監，掌國史」並〈文苑·左思傳〉「秘書監賈謐請講《漢書》」。〔唐〕房玄齡等，《晉書》，卷 40，頁 1173；卷 92，頁 2377。

¹³⁸ 〔梁〕蕭統編，〔唐〕李善等注，《六臣注文選》，卷 54，頁 996-1002。

¹³⁹ 參見牛潤珍，《漢至唐初史官制度的演變》，頁 76-121。

¹⁴⁰ 〔唐〕劉知幾著，浦起龍通釋，王煦華整理，〈史官建置〉，《史通通釋》，卷 11，頁 288。

¹⁴¹ 〔晉〕陳壽撰，〔南朝宋〕裴松之注，〈周魴傳〉，《三國志》，卷 60，頁 1391-1392。《史通·外篇·史官建置》說「周處自左國史遷東觀令」〔唐〕劉知幾著，浦起龍通釋，王煦華整理，《史通通釋》，卷 11，頁 289。這說明他在吳任過史官。

《吳書》」。¹⁴² 第二是張勃（?-?）。張勃是大鴻臚張儼（?-266）的兒子，¹⁴³ 張儼出使洛陽弔祭司馬昭，寶鼎元年（266）死於歸途。¹⁴⁴ 《隋志》著錄「晉有張勃《吳錄》三十卷，亡」，¹⁴⁵ 不過在《三國志》裴松之注等傳世文獻中，仍可見《吳錄》的不少佚文。第三是胡沖（?-?）。胡沖為胡綜（183-243）之子，這父子二人的傳都見於陳壽《三國志·吳書》。據說孫權時代的「諸文誥策命，鄰國書符，略皆（胡）綜所造也」，而胡沖在天紀年間為中書令，是同薛瑩一道最後勸孫皓投降的人，入晉後為尚書郎、吳郡太守，¹⁴⁶ 其所撰《吳曆》六卷、《吳朝人士品秩狀》八卷，則見於新舊《唐志》的著錄。¹⁴⁷ 陳壽在《三國志》終卷《吳書·王樓賀韋華傳》的「評曰」中，引他的話說：「胡沖以為（樓）玄、（賀）劭、（王）蕃一時清妙，略無優劣。必不得已，玄宜在先，劭當次之。華覈文賦之才，有過於曜，而典誥不及也。」¹⁴⁸ 說明他撰《吳曆》，大概還在陳壽寫《吳書》以前。

除了這些吳人，又除了陳壽，編寫吳國史的，西晉時還有環濟（?-?）。環濟是淮陽人，太學博士，《隋志》著錄有他的《喪服要略》一卷、《帝王要略》十二卷，並有《吳紀》九卷。¹⁴⁹ 環濟外，尚有虞溥（?-?）的《江表傳》。虞溥是高平昌邑人，歷任尚書都令史、

¹⁴² [唐]房玄齡等，〈周處傳〉，《晉書》，卷 58，頁 1570。

¹⁴³ 司馬貞索隱曰：「張勃，晉人，吳鴻臚儼之子也，作《吳錄》。」[漢]司馬遷著，[劉宋]裴駟集解，[唐]司馬貞索隱，[唐]張守節正義，〈伍子胥列傳〉，《史記》，卷 66，頁 2173。

¹⁴⁴ [晉]陳壽撰，[南朝宋]裴松之注，〈三嗣主傳〉，《三國志》，卷 48，頁 1165。

¹⁴⁵ 《隋書·經籍志》：「環濟撰《吳紀》。」[唐]魏徵等，〈經籍志〉，《隋書》，卷 3，頁 955。

¹⁴⁶ 《三國志·胡綜傳》並注引《吳錄》。[晉]陳壽撰，[南朝宋]裴松之注，《三國志》，卷 62，頁 1418。

¹⁴⁷ 胡沖《吳朝人士品秩錄》、《吳曆》，見於[後晉]劉昫等，〈經籍志〉，《舊唐書》，卷 46，頁 1995、1996；[宋]歐陽修、宋祁，〈藝文志〉，《新唐書》，卷 58，頁 1461。

¹⁴⁸ 《三國志·王樓賀韋華傳·評曰》。[晉]陳壽撰，[南朝宋]裴松之注，《三國志》，卷 65，頁 1470。

¹⁴⁹ [唐]魏徵等，〈經籍志〉，《隋書》，卷 32，頁 920；〈經籍志〉，卷 33，頁 961、955。

公車司馬令、鄱陽內史，死於洛陽，他兒子虞勃（?-?），在過江後將他所撰《江表傳》呈上晉元帝（276-323），¹⁵⁰ 裴松之於《三國志》注中頗多引述，並稱「溥著《江表傳》，亦粗有條貫。」¹⁵¹

上述關於吳的歷史書寫，從韋昭主持的《吳書》、周處的《吳書》、張勃的《吳錄》、胡沖的《吳曆》，到陳壽的《吳書》、環濟的《吳紀》、虞溥的《江表傳》，大概都是在陸機編寫《吳書》以前，或者與他同時，其中韋昭的《吳書》、胡沖的《吳曆》、陳壽的《吳書》，應該都包括在陸雲寫給陸機信中提到的「諸人所作」裡面，而這些「諸人所作」中，給陸機帶來最大衝擊的，應當是陳壽。

陳壽《三國志》撰著之始，是在太康初年，《晉書·陳壽傳》等記這部書寫成後，見者皆「稱其善敘事，有良史之才」，張華（232-300）甚至說「以班固、史遷不足方也」，¹⁵² 又打算「以《晉書》相付。」¹⁵³ 夏侯湛（243-291）本來在寫《魏書》，看到陳壽的《三國志》，「便壞己書而罷。」¹⁵⁴ 夏侯湛死於元康初年，¹⁵⁵ 《三國志》的初稿特別是《魏書》初稿，最晚便當寫成於這一年。而陳壽死於晉惠帝元康七年（297），這一年，自然是《三國志》定稿的時間下限。陳壽死後，梁州大中正尚書郎范頽（?-?）等上表，稱《三國志》「辭多勸誡，明乎得失，有益風化。雖文豔不若相如，而質直過之。願垂採錄」，於是有詔書下給河南尹、洛陽令，責成他們「就家寫其書」。《三國志》於是進入官府。¹⁵⁶

¹⁵⁰ [唐]房玄齡等，〈虞溥傳〉，《晉書》，卷 82，頁 2141。

¹⁵¹ [晉]陳壽撰，〔南朝宋〕裴松之注，〈三少帝紀〉，《三國志》，卷 4，頁 133。

¹⁵² [晉]陳壽撰，〔南朝宋〕裴松之注，〈三國志〉，卷 65，頁 1475。

¹⁵³ [唐]房玄齡等，〈晉書〉，卷 82，頁 2137-2138。

¹⁵⁴ [唐]房玄齡等，〈晉書〉，卷 82，頁 2137。

¹⁵⁵ [唐]房玄齡等，〈陳壽傳〉，《晉書》，卷 82，頁 2137；〈夏侯湛傳〉，卷 55，頁 1491。陸侃如繫於元康元年。陸侃如，《中古文學系年》（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5 年），頁 740。

¹⁵⁶ [唐]房玄齡等，〈陳壽傳〉，《晉書》，卷 82，頁 2137-2138。參見〔清〕趙翼著，王樹民

陳壽《三國志》的完成，對於自太康初期就已籌備編纂國史的西晉官方，顯然帶來不小的震動，在秘書監賈謐的主持下，於是再次召集有關《晉書》限斷的討論，這時，陸機也恰好在著作局。兩年前，他由吳王郎中令遷尚書郎，回到洛陽，滎陽潘岳（247-300）曾代賈謐寫過一組詩相贈，以慶賀他們別後重逢，但這組詩卻是從「肇自初創，二儀網緼」寫起，一直寫到漢末三國，所謂「靈獻微弱，在涅則淪。三雄鼎立，孫啟南吳。南吳伊何，僭號稱王」，再寫到「大晉統天，仁風遐揚。偽孫銜璧，奉土歸疆」，然後才是陸生（陸機）的「播名上京」，一步一步，終於到達「優遊省闈，珥筆華軒。」¹⁵⁷ 在詩中，寫到三國鼎立，潘岳稱孫吳是「僭號稱王」，可是等到陸機答詩，回應這一節，卻是說「在漢之季，皇綱幅裂」，「雄臣馳驚，義夫赴節」，「乃眷三哲，俾乂斯民」，「爰茲有魏，即宮天邑。吳實飛龍，劉亦嶽立」，非常清楚地將魏、蜀、吳視作對等的三方，而後他又寫「天厭霸德，皇祚告釁。獄訟違魏，謳歌適晉」、「庸岷稽顙，三江改獻」，¹⁵⁸ 意思是晉能夠順從天意，才相繼征服各自稱霸的魏、蜀、吳，實現統一。從這一組本來是表達相互間友好情誼的贈答詩裡可以看到，在兩年前，陸機和代表賈謐的潘岳，已經就漢末三國晉這一段歷史，交換了各自的看法和分歧，作為吳人的陸機，在詩裡明確表達了他對魏晉人的歷史敘述並不認同，甚或有激烈對抗的意思。而參與晉書限斷討論及編寫《晉紀》的經歷，更是刺激了他在〈辨亡論〉中寫到的那種「〈麥秀〉悲殷之思、〈黍離〉潛周之感」，¹⁵⁹ 由此產生為故國保存歷史的衝動。

校證，「三國志書法」，《廿二史劄記校證》，卷6，頁86。

¹⁵⁷ 〔晉〕潘岳，〈為賈謐作贈陸機〉，見〔梁〕蕭統編，〔唐〕李善等注，《六臣注文選》，卷24，頁457-459。

¹⁵⁸ 〔晉〕陸機，〈答賈長淵〉，見〔梁〕蕭統編，〔唐〕李善等注，《六臣注文選》，卷24，頁451-453。

¹⁵⁹ 〔晉〕陸機，〈辨亡論〉，見〔梁〕蕭統編，〔唐〕李善等注，《六臣注文選》，卷53，頁994。

〈麥秀〉相傳為箕子（?-?）作，《史記·宋微子世家》說：「其後箕子朝周，過故殷虛，感宮室毀壞，生禾黍，箕子傷之，欲哭則不可，欲泣為其近婦人，乃作〈麥秀〉之詩以歌詠之。其詩曰：『麥秀漸漸兮，禾黍油油。彼狡童兮，不與我好兮！』所謂狡童者，紂也。」¹⁶⁰〈黍離〉見於《詩經·王風》，〈毛序〉以為「閔宗周也。周大夫行役于宗周，過故宗廟宮室，盡為禾黍。閔周室之顛覆，彷徨不忍去，而作是詩也。」¹⁶¹用這兩個典故，表明陸機入晉後，回望吳的歷史，有一種箕子和周大夫式的很深的感傷與沉痛。¹⁶²這時他和陸雲看到陳壽寫的《吳書》，更生出再不動筆而「此一國事遂亦失」的焦慮，並且激起了與之一較短長的鬥志。

四、《吳書》與〈辨亡論〉

在將近兩年的著作郎任上，陸機既奉命編纂了《晉惠帝起居注》、《晉紀》、《晉惠帝百官名》，寫下〈漢高祖功臣頌〉以及「覽遺籍以慷慨」的〈吊魏武帝文〉，又在陸雲的鼓勵和協助下，開始落實他關於《吳書》的修纂計畫。可惜這一計畫在兩年後便無法繼續實施，最終只是在陸雲寫給陸機的信中，留下他們圍繞《吳書》曾經反覆商討的痕跡，商談的內容，包括有相關史實的確證、史料的搜集，也包括選擇什麼樣的人入傳、入什麼傳等。陸雲的信，顯示他們還十分關注

¹⁶⁰ [漢]司馬遷著，[劉宋]裴駟集解，[唐]司馬貞索隱，[唐]張守節正義，《宋微子世家》，《史記》，卷38，頁1620-1621。

¹⁶¹ [宋]朱熹著，趙長征點校，〈詩序辨說〉，《詩集傳》（北京：中華書局，2017年），頁28。

¹⁶² 陸機〈皇太子賜宴詩序〉曰：「元康四年秋，余以太子洗馬出補吳王郎中，以前事倉卒，未得宴。」[晉]陸機著，金濤聲點校，《陸機集》，卷5，頁38。姜亮夫（1902-1995）據以判斷陸機曾於元康四年（294）歸吳。姜亮夫，《陸機年譜》（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57年），頁57。如果確有此事，那麼〈麥秀〉、〈黍離〉之感，又不單純是由回顧歷史所引發，而是確有所指。

其他人寫的吳國史。這也不奇怪，正如蜀人陳壽寫《蜀書》，也要依傍楊戲的〈季漢輔臣贊〉，¹⁶³ 寫《吳書》，要依賴於韋昭的《吳書》，寫《魏書》，則要依賴於王沉（?-266）的《魏書》。¹⁶⁴ 陸機要記敘他心中的吳國史，也需要搜集史料，同時參閱其他人的相關書寫。這一點，從他現存的〈顧譚傳〉便可以看到，而〈顧譚傳〉又很可能是《吳書》裡的一篇。其曰：

宣太子正位東宮，天子方隆訓導之儀，妙簡俊彥，講學左右。時四方之傑畢集，太傅諸葛恪等雄奇蓋眾，而譚以清識絕倫，獨見推重。自太尉范慎、謝景、羊徽之徒，皆以秀稱其名，而悉在譚下。¹⁶⁵

顧譚是顧雍孫、陸遜外甥，在陳壽《吳書》裡，他的傳是附在〈顧雍傳〉下，主要寫他「弱冠與諸葛恪等為太子四友」，而在顧雍死後，因得罪孫霸，赤烏九年（246）被流放，死於交趾的經過。所謂「太子四友」，據陳壽《吳書·吳主五子孫登傳》，指的是黃初二年（221），孫權為孫登「選置師傅，銓簡秀士，以為賓友，於是諸葛恪（203-253）、張休、顧譚、陳表（204-237）等以選入」，黃龍元年（229）立皇太子，「以恪為左輔，休右弼，譚為輔正，表為翼正都尉，是為

¹⁶³ 《三國志·蜀書·楊戲傳》曰：「戲以延熙四年著〈季漢輔臣贊〉，其所頌述，今多載于《蜀書》，是以記之於左。」〔晉〕陳壽撰，〔南朝宋〕裴松之注，《三國志》，卷45，頁1079。

¹⁶⁴ 參見宋《中興書目》曰：「初，王沉撰《魏書》，為時諱惡，殊非實錄。項峻撰《吳書》，韋昭續成之，五十五卷，壽集為《三國志》。」〔宋〕王應麟輯，〈藝文〉「三國志」條引，《玉海》（揚州：廣陵書社，2003年影印光緒九年〔1883〕浙江書局本），卷46，頁865。並趙翼《廿二史劄記》「三國志立傳繁簡不同處」條：「然則壽《志》立傳，悉本舊史，舊史所無者，概不書也。」〔清〕趙翼著，王樹民校證，《廿二史劄記校證》，卷6，頁130。

¹⁶⁵ 《三國志·吳書·顧雍傳》裴注引「陸機為譚傳曰」。〔晉〕陳壽撰，〔南朝宋〕裴松之注，《三國志》，卷52，頁1231。案，羊徽，「徽」當是「衡」之誤。並參見任彥升〈為范尚書讓吏部封侯第一表〉，李善注引陸機〈顧譚誄〉：「遷吏部尚書，才長於權衡而綜核人物。」〔梁〕蕭統編，〔唐〕李善等注，《六臣注文選》，卷38，頁715。

四友」，其餘「謝景、范慎、刁玄、羊衝等皆為賓客，於是東宮號為多士」，在孫登心目中，這些人，如「張休、顧譚、謝景，皆通敏有識斷，入宜委腹心，出可為爪牙。」¹⁶⁶ 又據裴松之注引韋昭的《吳書》記載，顧譚「初踐官府，上疏陳事」，便已特受孫權青睞，「見待甚隆，數蒙賞賜，特見召請」。¹⁶⁷ 在裴注引虞溥〈江表傳〉中，也記載著孫登授意胡綜作〈賓友目〉，於顧譚，評價是「精識時機，達幽究微」。¹⁶⁸ 而陸機的〈顧譚傳〉，大概主要就是依據這些史傳提供的材料編寫而成，像他評論顧譚「清識絕倫」，與孫登說顧譚等「皆通敏有識斷」、胡綜說顧譚「精識時機」，就相當一致。這也表明，儘管顧、陸兩家是姻親，可是顧譚畢竟死在陸機兄弟出生以前，無論是為他寫傳還是寫誄，¹⁶⁹ 對陸機來說，都離不開傳世的相關記載或口頭傳說，要靠這些其他人的記錄和描述，構成他寫作《吳書》的基本史料。換句話說就是，陸機關於吳國歷史的認識和構想，並非他所獨有，他寫《吳書》，也不可能完全是獨創。

《晉書·陸機傳》記〈辨亡論〉作於陸機兄弟進入洛陽的太康末年以前，¹⁷⁰ 但是它的最終定稿，應當有一個比較長的時間。它回顧吳國興亡的歷史，從武烈皇帝「電發荊南」，經過長沙桓王、大皇帝、幼主、景皇，到歸命侯，於晉太康元年「邦家顛覆」，又歷數每一階

¹⁶⁶ [晉]陳壽撰，[南朝宋]裴松之注，〈吳主五子孫登傳〉，《三國志》，卷 59，頁 1363-1366。

¹⁶⁷ 《三國志·吳書·顧譚傳》裴注引《吳書》。[晉]陳壽撰，[南朝宋]裴松之注，《三國志》，卷 52，頁 1231。

¹⁶⁸ 《三國志·吳書·吳主五子孫登傳》裴注引《江表傳》。[晉]陳壽撰，[南朝宋]裴松之注，《三國志》，卷 59，頁 1364。

¹⁶⁹ 陸機〈吳太常顧譚誄〉，見任昉〈為范尚書讓吏部封侯第一表〉李善注引。[梁]蕭統編，[唐]李善等注，《六臣注文選》，卷 38，頁 715。

¹⁷⁰ 參見朱東潤，〈陸機年表〉，《國立武漢大學文哲集刊》1930年第1期，頁 173-187；姜亮夫，〈陸機年譜〉，頁 31；[日]高橋和巳，〈陸機の伝記とその文學〉，《高橋和巳全集》（東京：河出書房，1978年），頁 83-178；徐公持，〈陸機與陸雲〉，《魏晉文學史》，（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99年），頁 362。

段的公卿大臣，總計四十六人，他們是陸機心中吳國歷史上最重要的人物。正如司馬談（165-110 B.C.）留下遺囑說：「今漢興，海內一統，明主賢君忠臣死義之士，余為太史而弗論載，廢天下之史文，余甚懼焉，汝其念載！」司馬遷遵從父親遺願，「悉論先人所次舊聞」，寫下記述「明主賢君忠臣死義之士」的《史記》，¹⁷¹ 陸機大概也是準備了要以這五十多名吳的君臣，來構成他計畫中《吳書》的骨幹。這也就可以解釋陸雲在給陸機的信中，為什麼談論《吳書》的時候，話題突然轉到「〈辨亡〉已是〈過秦〉對事」上面。不妨將陸機〈辨亡論〉中提到的名臣，與陳壽《吳書》所寫各傳的傳主，放在一起稍加對照，便可以看到〈辨亡論〉是否已經呈現了一個完整的吳國歷史脈絡，¹⁷² 又是否可以視之為陸機所撰《吳書》的一個歷史總論。

表一：陸機〈辨亡論〉與陳壽《吳書》對照表

	陸機〈辨亡論〉	陳壽《吳書》
1	於是張昭為師傅	卷七，張昭（子承）、顧雍、諸葛瑾、步騭
2	周瑜、陸公、魯肅、呂蒙之儔入為腹心，出作股肱	卷九，周瑜、魯肅、呂蒙 卷十三，陸遜（子抗）
3	甘寧、凌統、程普、賀齊、朱桓、朱然之徒奮其威 韓當、潘璋、黃蓋、蔣欽、周	卷十，程普、黃蓋、韓當、蔣欽、周泰、陳武、董襲、甘寧、凌統、徐盛、潘璋、丁奉

¹⁷¹ 〔漢〕司馬遷著，〔劉宋〕裴駰集解，〔唐〕司馬貞索隱，〔唐〕張守節正義，〈太史公自序〉，《史記》，卷 130，頁 3295。

¹⁷² 參見葉建華，〈陸機及其史學〉，《學術月刊》第 8 期，1989 年 8 月，頁 47-52。此文已經將陸機的〈辨亡論〉、〈五等論〉、〈漢高祖功臣頌〉、《晉紀》都歸為史學論著，並認為〈辨亡論〉、〈漢高祖功臣頌〉作於同時，但文章還是因襲舊說，以為〈辨亡論〉是陸機入晉前所寫。

	泰之屬宣其力	卷十一，朱治、朱然、呂範、朱桓 卷十五，賀齊
4	風雅則諸葛瑾、張承、步騭以聲名光國	卷七，張承、諸葛瑾、步騭
5	政事則顧雍、潘濬、呂範、呂岱以器任幹職	卷七，顧雍 卷十六，潘濬、陸凱 卷十一，呂範 卷十五，賀齊、全琮、呂岱、周魴、鍾離牧
6	奇偉則虞翻、陸績、張溫、張惇以諷議舉正	卷十二，虞翻、陸績、張溫、駱統、陸瑁、吾粲、朱據 卷十八，劉惇
7	奉使則趙諮、沈珩以敏達延譽	卷二，吳主傳(裴注引《吳書》)
8	數術則吳范、趙達以機詳協德	卷十八，吳范、劉惇、趙達
9	董襲、陳武殺身以衛主	卷十，陳武、董襲
10	駱統、劉基強諫以補過	卷十二，駱統 卷四，劉繇(劉基)
11	大司馬陸公以文武熙朝	卷十三，陸遜(陸抗)
12	左丞相陸凱以謇諤盡規	卷十六，潘濬、陸凱
13	施績、范慎以威重顯	卷十一，朱績
14	丁奉、鍾離斐以武毅稱	卷十，丁奉 卷十五，鍾離斐
15	孟宗、丁固之徒為公卿	
16	樓玄、賀劭之屬掌機事	卷二十，王蕃、樓玄、賀劭、韋曜、華覈
17	士燮蒙險而效命	卷四，劉繇、太史慈、士燮

當然，陸機計畫中的《吳書》，不會是照著陳壽的《吳書》去寫，陳壽在《吳書》中為大約九十個人物作傳，比〈辨亡論〉裡的也多了幾乎一倍。但值得注意的是，〈辨亡論〉中出現的人物，在陳壽《吳書》裡大多都有專傳，陳壽《吳書》不予立傳的，如丞相孫邵（163-225），〈辨亡論〉也未提及。¹⁷³ 同時，〈辨亡論〉為這些人作的「風雅」、「政事」、「奇偉」、「奉使」、「數術」等分類，與陳壽在《吳書》中利用卷次之分而對他們進行的歸類，有不少相差無幾，這在以上的對照中，可以一目了然。這大概能夠說明〈辨亡論〉寫到的人，在當時，基本上已是公認的吳國的「忠臣死義之士」，確實值得濃墨重彩地寫進吳的歷史。即使〈辨亡論〉提到而在陳壽《吳書》中未有專傳的，如張惇（?-?）、趙諮（?-?）、沈珩（178-215）、范慎（?-273）、孟宗（?-271）、丁固（198-273）等六人，其中，趙諮、沈珩是在韋昭《吳書》中有傳，¹⁷⁴ 張惇（敦）、范慎、孟宗在張勃《吳錄》中有傳，¹⁷⁵ 丁固也在胡沖《吳歷》中有傳。¹⁷⁶ 這也表明，在考慮要為哪些吳人立傳時，陸機的選擇，大體上也還是遵從當時的一般輿論，所以，是否要為姚信立傳，也才會成為在陸雲看來是值得討論

¹⁷³ 孫邵在黃武初為丞相，死於黃武四年（225），見《三國志·吳書·吳主傳》裴注引《吳錄》有其傳，而引《志林》記劉聲叔說「項竣、丁孚時已有注記，此云與張惠恕（?-?）不能。後韋氏作史，蓋惠恕之黨，故不見書。」〔晉〕陳壽撰，〔南朝宋〕裴松之注，《三國志》，卷 47，頁 1131-1132。說明早已有人注意到韋昭、陳壽不曾為孫邵立傳的問題。

¹⁷⁴ 〈吳主傳〉裴注引《吳書》。〔晉〕陳壽撰，〔南朝宋〕裴松之注，《三國志》，卷 47，頁 1123-1124。陳博考韋昭《吳書》有紀有傳，其中陶謙（132-194）、陳化（?-?）、馮熙（?-223）、沈珩、李肅（?-192）、鄭泉（?-?）、趙諮諸人傳，都不見於陳壽《三國志·吳書》。陳博，〈韋昭《漢書》考〉，《文獻》1996 年第 3 期，頁 74。

¹⁷⁵ 張惇，見〈顧雍傳·裴注〉；范慎，見〈吳主五子傳·裴注〉；孟宗，見〈三嗣主傳·裴注〉。〔晉〕陳壽撰，〔南朝宋〕裴松之注，《三國志》，卷 52，頁 1229；卷 59，頁 1363；卷 48，頁 1169。

¹⁷⁶ 丁固，見〈三嗣主傳·裴注〉。〔晉〕陳壽撰，〔南朝宋〕裴松之注，《三國志》，卷 48，頁 1163。

的問題。

至於陳壽對吳何以亡的看法，儘管與晉武帝為代表的晉人相似，即認為自孫權晚年就已顯露而到孫皓時愈演愈烈的暴政，是吳亡的根本原因，但是在《吳書》中，他也引用過孫策對孫權的臨終囑咐：「舉江東之眾，決機於兩陳之間，與天下爭衡，卿不如我；舉賢任能，各盡其心，以保江東，我不如卿。」¹⁷⁷ 似乎「舉賢任能」，原本是孫策為孫權制定的方略，而孫亮的「童孺而無賢輔」、孫休的「不能拔進良才」以及孫皓的「肆行殘暴，忠諫者誅，讒諛者進」，¹⁷⁸ 在他看來，也是造成吳的政治越來越混亂衰敗的原因。而這也正是陸機在〈辨亡論〉中指出的，孫皓之弊政，在於「舍其參者」。在《蜀書》中，陳壽總結故國蜀的歷史教訓，更有對蜀先主、後主的對照式評論，即一面稱讚先主的「弘毅寬厚，知人待士，蓋有高祖之風，英雄之器焉。及其舉國托孤於諸葛亮，而心神無貳，誠君臣之至公，古今之盛軌也」，¹⁷⁹ 一面批評後主的「任賢相則為循理之君，惑闇豎則為昏闇之后，傳曰『素絲無常，唯所染之』，信矣哉」，¹⁸⁰ 意思是蜀的興起，是由於劉備的「知人待士」而有公心，托孤於諸葛亮，蜀的滅亡，則由於諸葛亮死後再無賢相，蜀的制度便逐漸崩壞。這一判斷，與〈辨亡論〉對吳之興亡的分析，思路一樣，都是視「授任之才」為國之存亡的關鍵。而這也可以說是陳壽、陸機他們這同一時代的人共有的歷史觀念。

從陸雲寫給陸機的信中可以看到，陸機計畫中的《吳書》，採用的是紀傳體寫法。史書的紀傳體寫法是由《史記》開創，《史記》同時還開創了在每一篇篇末，以「太史公曰」起頭，對所述歷史事件及

¹⁷⁷ 〔晉〕陳壽撰，〔南朝宋〕裴松之注，〈孫討逆傳〉，《三國志》，卷 46，頁 1109。

¹⁷⁸ 〔晉〕陳壽撰，〔南朝宋〕裴松之注，〈三嗣主傳〉，《三國志》，卷 48，頁 1178。

¹⁷⁹ 〔晉〕陳壽撰，〔南朝宋〕裴松之注，〈先主傳〉，《三國志》，卷 32，頁 892。

¹⁸⁰ 〔晉〕陳壽撰，〔南朝宋〕裴松之注，〈後主傳〉，《三國志》，卷 53，頁 902-903。

人物加以評論的史評方式。¹⁸¹ 陸雲說「〈辨亡〉則已是〈過秦〉對事」，〈過秦〉就是被首先寫進「太史公曰」，被當作這樣的一個歷史評論的，後來〈辨亡〉也被當作對陳壽之史評的補充，由裴松之引在《三國志·吳書·三嗣主傳》「評曰」的下面。周一良曾注意到魏晉南北朝史書有一個特點，是較過去多出了歷史「總論」。這樣的「總論」，他說始於東晉干寶（286-336）的〈晉紀總論〉，後來還有梁裴子野（469-530）的《宋略·總論》、陳何之元（?-?）的《梁典·總論》，都是由本朝人寫本朝史或親身經歷過的前朝歷史，而以總論的方式，來「綜論一代政治上的治亂興衰，指出歷史經驗教訓。」¹⁸² 他又分析「總論」的出現，是史家受到南方玄學的影響，開闊了思路和視野，提高了思辨能力，因而能宏觀地觀察一代之發展變化的結果。他也提到〈過秦論〉和〈辨亡論〉，不過，卻說它們「有近似的內容，但不是歷史書的總論。」¹⁸³ 這是從史學史的角度來看陸機的〈辨亡論〉，當然，還沒有承認它就是歷史書寫。

而在《文心雕龍·頌贊》篇中，關於《史記》「太史公曰」等史評的起源，卻有「相如屬筆，始贊荊軻」的推斷，¹⁸⁴ 劉勰認為最早的史評，應該是司馬相如（179-117 B.C.）的「荊軻贊」。但在《漢書·藝文志》中，「荊軻贊」又被著錄為「司馬相如等論之」的「〈荊軻論〉五篇」。¹⁸⁵ 這就說明「贊」和「論」，自漢代以來，名異實同，歷史評論既可稱「贊」，也可稱「論」。而這也就是陸機的〈辨亡論〉，雖以「論」為名，可是在陸雲眼裡，又或在晚於他們兩個甲子的裴松之

¹⁸¹ 參見遼耀東，〈史傳論贊與「太史公曰」〉，《抑鬱與超越——司馬遷與漢武帝時代》（臺北：東大圖書，2007年），頁349-388。

¹⁸² 周一良，〈魏晉南北朝史學著作的幾個問題〉，頁494。

¹⁸³ 周一良，〈魏晉南北朝史學著作的幾個問題〉，頁494。

¹⁸⁴ 〔梁〕劉勰著，范文瀾注，《文心雕龍注》，卷2，頁158。

¹⁸⁵ 〔漢〕班固撰，〔唐〕顏師古注，《漢書》，卷10，頁1741。參見遼耀東，〈史傳論贊與「太史公曰」〉，頁354。

眼裡，就等於史評的原因。但這一史評，顯然不是針對某一個個人的紀傳，它是如周一良說，「綜論一代政治上的治亂盛衰，指出歷史教訓。」儘管今天的研究，尚未能揭示〈辨亡論〉與陸機計畫中的《吳書》有什麼樣具體的聯繫，但是由於〈辨亡論〉的寫作及定稿，與陸機參與晉史的官方修纂，同時擬定《吳書》的寫作計畫，幾件事情基本同步，這一點，通過對陸機、陸雲傳世詩文的分析，尤其是解讀陸雲寫給陸機的信，已能基本確定，在這一基礎上進一步推測便可知，正是因為有這一系列的歷史考察、歷史編寫，才促使陸機全面系統地認識吳的興衰史，並就吳何以亡作深刻反思，首先寫出「綜論一代政治上的治亂興衰」的〈辨亡論〉來。特別是在〈辨亡論〉中，就像《晉書·陸機傳》所說，既有對「權所以得，皓所以亡」的剖析，又有對「其祖父功業」的謳歌，呈現為兩條主線，與陸雲在信中向陸機提出寫《吳書》時要「公私並敘」的修史方案，高度一致，因此，說〈辨亡論〉便是陸機擬議中《吳書》的「總論」，也許並不為過。

當然，這也就意味著周一良發現的魏晉南北朝史書中特有的「總論」，它實際的寫作，應當是從陸機〈辨亡論〉開始，比干寶寫〈晉紀總論〉，大約要早二三十年。《晉書》記載干寶新蔡人，不過，他的祖父干統（?-?）原是吳的奮武將軍、都亭侯，父親干瑩（?-351）為丹楊丞，他本人在東晉初年任佐著作郎。¹⁸⁶ 從他的父祖和他本人的經歷可以知道，他大概像陸機一樣，對三史也相當熟悉，並知道賈誼，讀過〈辨亡論〉。可以證明這一點的，是〈晉紀總論〉在寫到西晉末禮教崩弛時，出現了「民風國勢如此，雖以中庸之才、守文之主治之，辛有必見之于祭祀，季札必得之于聲樂，范燮必為之請死，賈誼必為之痛哭，又況我惠帝以放（一本作蕩）蕩之德臨之哉」這樣的

¹⁸⁶ [唐]房玄齡等，〈干寶傳〉，《晉書》，卷82，頁2149。

句式，¹⁸⁷ 與〈過秦論〉說「藉使子嬰有庸主之材，僅得中佐，山東雖亂，秦之地可全而有，宗廟之祀未當絕也」，¹⁸⁸ 與〈辨亡論〉說「借使中才守之以道，善人御之有術，敦率遺憲，勤民謹政，循定策，守常險，則可以長世永年，未有危亡之患也」，¹⁸⁹ 句法何其相似，何況其中提到賈誼。不難想見干寶曾經熟讀〈過秦論〉〈辨亡論〉，並且在寫〈晉紀總論〉的時候，有意模仿，只是他認為西晉之亡，亡在仁政未修、禮教崩弛，與賈誼、陸機的著眼點又有不同。而唐人修《晉書》，將〈晉紀總論〉綴於〈孝愍帝紀〉「史臣曰」下，大概也是借鑒了司馬遷、裴松之的辦法。

干寶講述西晉歷史，說太康滅吳後，「天下書同文，車同軌，牛馬被野，餘糧棲畝」，迎來了最好的時代，是「百世之一時」，而後來墮入「民不見德，唯亂是聞」，禮法刑政破敗，卒於傾覆，轉捩點就在晉武帝去世，只是那時晉的餘脈未斷，「故大命重集於中宗元皇帝。」¹⁹⁰ 陸機兄弟是在干寶所說晉的最好時代到達洛陽的，他們一面期待能在新朝發揮自己的才能，如同他們的父祖之為吳的股肱，也變成晉的功臣，一面追懷往事，期待用〈辨亡論〉、《吳書》和〈祖考頌〉等寫作，使故國及其父祖永遠地保留在文字記憶中。可惜他沒有預見到時代的迅速轉圜，變化之快，令他們措手不及，未能防範。而陸機也更不會料到，三百年後，唐太宗（598-649）對他有「睹其文

¹⁸⁷ [梁]蕭統編，[唐]李善等注，《六臣注文選》，卷49，頁925-934；[唐]房玄齡等，〈孝懷帝孝愍帝紀〉，《晉書》，卷5，頁132-137。周一良〈晉書札記〉「干寶《晉紀》總論」條，其謂《晉書》所錄較《文選》本有刪略。周一良，《魏晉南北朝史札記》（北京：中華書局，1985年），頁46。

¹⁸⁸ [漢]司馬遷著，[劉宋]裴駰集解，[唐]司馬貞索隱，[唐]張守節正義，《史記》，卷6，頁276。

¹⁸⁹ [晉]陳壽撰，[南朝宋]裴松之注，〈三嗣主傳〉，《三國志》，卷48，頁1181。

¹⁹⁰ [晉]干寶，〈晉紀總論〉，見[梁]蕭統編，[唐]李善等注，《六臣注文選》，卷49，頁925-934。

章之誠，何知易而行難」的評價。¹⁹¹ 魏元忠（?-707）聲討「論武者以弓馬為先，而不稽之以權略，談文者以篇章為首，而不問之以經綸」的浮誇風氣，將他也歸入「以篇章為首」的談文者中，視之為何晏、王弼一流，並且不無鄙夷地說：「臣嘗讀魏、晉史，每鄙何晏、王衍終日談空；近觀齊、梁書，才士亦復不少，並何益於理亂哉？從此而言，則陸士衡著〈辨亡論〉，而不救河橋之敗，養由基射能穿札，而不止鄢陵之奔，斷可知矣。」¹⁹²

（責任校對：林泓任）

¹⁹¹ 〔唐〕房玄齡等，〈《晉書》·〈陸機陸雲傳〉〉，卷 54，頁 1487-1488。

¹⁹² 〔後晉〕劉昫等，〈《魏元忠傳》〉引唐高宗儀鳳中魏元忠上封事，〈《舊唐書》〉，卷 92，頁 2945-2946。

引用書目

一、傳統文獻

- 〔漢〕毛亨傳，〔漢〕鄭玄箋，〔唐〕陸德明音義，《毛詩注疏》，收入〔清〕阮元校勘，《十三經注疏》，臺北：藝文印書館，2013年。
- 〔漢〕司馬遷著，〔劉宋〕裴駙集解，〔唐〕司馬貞索隱，〔唐〕張守節正義，《史記》，北京：中華書局，1981年。
- 〔漢〕班固撰，〔唐〕顏師古注，《漢書》，北京：中華書局，1983年。
- 〔晉〕陳壽撰，〔南朝宋〕裴松之注，《三國志》，北京：中華書局，1981年。
- 〔晉〕陸機著，金濤聲點校，《陸機集》北京：中華書局，1982年。
- 〔晉〕陸機，《晉紀》，收入〔清〕湯球撰，黃奭輯，喬治忠校注，《眾家編年體晉史》，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89年。
- 〔晉〕陸雲著，黃葵點校，《陸雲集》，北京：中華書局，1988年。
- 〔梁〕劉勰著，范文瀾注，《文心雕龍注》，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1年。
- 〔梁〕蕭統編，〔唐〕李善等注，《六臣注文選》，北京：中華書局，2012年。
- 〔唐〕房玄齡等，《晉書》，北京：中華書局，1981年。
- 〔唐〕徐堅等，《初學記》，北京：中華書局，1980年。
- 〔唐〕虞世南輯，《北堂書鈔》，北京：中國書店，1989年影印光緒十四年（1888）南海孔廣陶本。
- 〔唐〕劉知幾著，浦起龍通釋，王煦華整理，《史通通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
- 〔唐〕魏徵等，《隋書》，北京：中華書局，1981年。
- 〔後晉〕劉昫等，《舊唐書》，北京：中華書局，1975年。
- 〔宋〕王應麟輯，《玉海》，揚州：廣陵書社，2003年影印光緒九年

(1883) 浙江書局本。

〔宋〕朱熹著，趙長征點校，《詩集傳》北京：中華書局，2017年。

〔宋〕歐陽修、宋祁，《新唐書》，北京：中華書局，1975年。

〔清〕姚振宗著，朱莉莉整理，《三國藝文志》，收入王承略、劉心明主編，《二十五史藝文經籍志考補萃編》，北京：清華大學出版社，2012年，第九卷。

〔清〕趙翼著，王樹民校證，《廿二史劄記校證》，北京：中華書局，2013年。

〔清〕嚴可均校輯，《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北京：中華書局，1985年。

上海師範大學古籍整理研究所校點，《國語》，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

遼欽立輯校，《先秦漢魏晉南北朝詩》，北京：中華書局，1980年。

二、近人論著

牛潤珍，《漢至唐初史官制度的演變》，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1999年。

朱東潤，〈陸機年表〉，《國立武漢大學文哲集刊》1930年第1期，頁173-187。

周一良，〈晉書札記〉，《魏晉南北朝史札記》，北京：中華書局，1985年，頁45-121。

_____，《魏晉南北朝史論》，瀋陽：遼寧教育出版社，1998年。

姜亮夫，《陸機年譜》，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57年。

陸侃如，《中古文學系年》，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5年。

陳博，〈韋昭《吳書》考〉，《文獻》1996年第3期，頁68-77。

徐公持，《魏晉文學史》，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99年。

遼欽立，〈《文賦》撰出年代考〉，《遼欽立文存》，北京：中華書局，

2010年，頁445-456。

遼耀東，〈史傳論贊與「太史公曰」〉，《抑鬱與超越——司馬遷與漢武帝時代》，臺北：東大圖書，2007年，頁349-388。

葉建華，〈陸機及其史學〉，《學術月刊》第8期，1989年8月，頁47-52。

俞士玲，《陸機陸雲年譜》，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9年。

〔日〕吉川忠夫，王啟發譯，《六朝精神史研究》，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12年。

〔日〕松本幸男，〈陸雲〈與平原書〉譯注（二）〉，《學林》第26號，京都：中國芸文研究會，1997年，頁97-133。

〔日〕高橋和巳，〈陸機の伝記とその文學〉，《高橋和巳全集》，東京：河出書房，1978年，頁83-187。

How did Wu Fall — Lu Ji’s “Disquisition on the Fall of a State”

Dai Yan*

Abstract

The “Bian wang lun” 辨亡論 (Disquisition on the Fall of a State) has historically been regarded as having been written by Lu Ji 陸機 before the fall of Wu 吳 and the beginning of Jin 晉. However, from a letter written by Lu Ji’s brother, Lu Yun 陸雲, it can be discerned that Lu Yun regarded this disquisition as belonging to both the genre of Jia Yi’s 賈誼 “Guo Qin lun” 過秦論 (Disquisition Finding Fault with Qin) and a work closely related to Lu Ji’s planned writing of *Wu shu* 吳書 (the *Book of Wu*). Throughout the eighth year of the Yuankang 元康 Reign (299), Lu Ji, in his capacity as Editorial Director, attended to his official duties in compiling dynastic histories at court. At the same time, Lu Ji and his brother were engaged in a public debate over how a history that included the perspective of the state of Wu could be incorporated into this compilation process. The final version of the “Disquisition on the Fall of a State” constitutes the general summary to this unfinished *Book of Wu*.

Key words: Lu Ji’s 陸機 “Bian wang lun” 辨亡論 (Disquisition on the Fall of a State), *Wu shu* 吳書 (the *Book of Wu*), Chen Shou’s 陳壽 *San guo zhi* 三國志 (Records of the Three

*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Fudan University, Shanghai

Kingdoms), Lu Yun's 陸雲 "Yu xiong Pingyuan shu" 與兄平原書 (Lu Yun and Lu Ji's 陸機 Correspondence), yi "Jin shu xian duan" 議「晉書限斷」(the periodization of the *Book of Jin*), Jia Yi's 賈誼 "Guo Qin lun" 過秦論 (Disquisition Finding Fault with Qin), Gan Bao's 干寶 "Jin ji zong lun" 晉紀總論 (General Summary" in the *Annals of Jin*)